

# 毒草集

批判右派思想言論選輯之一

復旦大學校刊編輯室

一九五七年八月

## 前 言

本集是摘錄王造時、陳仁炳、楊兆龍、孫大雨、王恆守、張孟聞、李梧齡、王中等八個右派分子的言論和綜合本校自“鳴”“放”以來教職員中的部分言論編成的，是“批判右派思想言論選輯”的第一輯。

八個右派分子的言論，以摘錄他們自己的發言及所寫的文章為主，而以別人揭發的材料作為補充。這些言論有的毒氣沖天、毒色明顯；但也有的文字晦澀，含義閃爍，就其一字一句而言，往往貌似香花，稍加辨認，則實是毒草。收集在毒草篇中的言論，有些是出諸右派分子之口；有些則是受了右派思想言論的影響、自覺或不自覺的做了右派分子的傳聲筒。我們把這些言論集合在一起的目的，是為了讓同志們從中明辨是非、吸取教訓，從而提高認識。

摘錄的材料有的是口語，我們為了避免影響原意而沒有加以修改，文中的重點是編者加的。

由於我們掌握的材料尚不充分，識別的能力有限，材料的取捨和安排難免有失當之處，尚希同志們指正。

校刊編輯室

1957年8月

# 复旦大学图书档案

## 目 錄

### 前 言

- 右派分子王造时的言論(摘录) . . . . . 1
- 右派分子陈仁炳的言論(摘录) . . . . . 13
- 右派分子楊兆龙的言論(摘录) . . . . . 30
- 右派分子孙大雨的言行(摘录) . . . . . 38
- 右派分子王恆守的言論(摘录) . . . . . 57
- 右派分子張孟聞的言論(摘录) . . . . . 72
- 右派分子李梧齡的八点綱領及部分言論 . . . . . 83
- 右派理論家王中的新聞学理論(摘录) . . . . . 88
- 毒草篇(綜合本校“鳴”“放”中的部分言論) . . . . . 96
- 匿名信 . . . . . 111

# 右派分子王造時的言論

(摘錄)

## 一、對我國民主、法治的看法和建議

1. “民主究竟是第一性的。”“過去偏重於專政，今後不能不重視民主。”

“當前的放鳴和整風，不是尋常的思想批評和作風端正，這次放鳴揭露了許多矛盾；黨內外同志也初步提供了些解決的辦法……

……個別地，細致地解決具體問題是應當的，也是必須的，但為了使這個運動不流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我們心目中應有一個總方向——那就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法治秩序的建立。”

(1957年5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屆四次政協會議上的發言)

“在階級鬥爭沒有基本上結束以前，因為要對付階級敵人所以偏重了專政；現在階級鬥爭已經基本上結束……我們今後便不能不重視民主。”

(1957年5月21日在新聞日報舉行的法學家座談會上的發言)

“民主生活必須擴大到基礎上去，民主制度必須建立在基礎上面……。從革命的發展過程看，集中或許是先行於民主；但從制度的本質上說，民主究竟是第一性。只有在民主基礎上談集中，這集中才是健全活潑。缺乏民主基礎的集中最是滋長官僚主義的溫床。”

(1957年5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屆四次政协会議上的發言)

“我們大家今天是置身在一个空前的扩大民主生活运动的前夕。”

(1957年5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屆四次政协会議上的發言)

2. “中国一向重人治輕法治，解放虽已八年，但……还有不少人治主义的封建殘余。”“党固不可以党代政，也不可以党代法。”

“中国几千年来受封建統治，不可能不受封建殘余思想的影响。包公所以深入人心其实就是人治的化身。”

(1957年6月在上海市政上海协及法学会所召开的政法座談会上回答王容海提出的四个問題)

“中国經過几千年的封建統治，向来重人治而輕法治，解放虽已經八年，但……还有不少人治主义的封建殘余。”

(1957年5月21日在新聞日报举行的法学家座談会上的發言)

“有一些机关干部輕視法律的規定，甚至有一些司法工作者有时也犯了有法不依的过失——这都是人治主义的表现。……全国人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沒有任何个人及机关、团体和党派是站在法律之上的……就是領導党的意志和政策也应该通过法律的制定及国家机关的执行来实现。党固不可以党代政，也不可以党代法。这不仅对人民是一种保障，对于党的威信也是一种保障。”

(1957年5月25日上海市一屆四次政协会議上的發言)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頒布以后好像逐渐被人

漠視。这个現象千万要不得。……誰要破坏宪法，我們就应起而力爭。……除宪法外，我們需要制定各种重要法典……作为我們共同生活的准繩。否則国家干部無法可依，一般人民無法可守，权利与义务搞个不清楚，犯罪不犯罪沒有明确界綫，人治主义便要抬头，社会就不容易納入軌道。”

(1957年6月1日新聞日报)

3. “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夠安全之感。”

“建立法制与一般人所謂‘安全感’有关。現在法規還沒有。因此，講話沒有保障。”

(1957年5月4日在上海市一屆四次政協預各會議小組討論會上的發言)

“依据宪法，我們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但是我們還沒有通过普通的立法来把他們完全实现。……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違法的，什么是犯罪的，什么是不犯罪的，在什么範圍內可以自由，在什么範圍以外沒有自由，如何审判，如何处罰，在很多地方都还缺乏明确的規定。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夠安全之感。”

(1957年5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屆四次政協會議上的發言)

4. 鎮反“不公道”，肃反“令人猜疑”，可以考慮“大赦”、“特赦。”

“过去的一些大战犯，大特务現在都要放出来了，而許多小反革命分子及刑事罪犯却仍然关在里面，这是不公道的，我主張在相当時間后来一个大赦。”

(1955年5月11日在市政協常委会第九次扩大會議小組會上)

的發言)

“对普通刑事犯、罪行輕微的、已低头認罪表現好的三类罪犯可以考虑大赦。”“特赦也是寬大的一种方式，可以与‘鎮反’相得益彰。”

(1955年6月16日在上海市政协常委会第二次會議小組会上的發言)

“过去公安局逮捕人是不按法定程序的，也不經過檢察院批准。去年肅反中，各校都有教授被捕，被捕时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后来又釋放。但不交代为什么捕和为什么放的原因，令人猜疑不定。”

(1956年12月29日在上海市二屆一次人代会預备會議分組討論会上的發言)

1957年1月2日在上海市二屆一次人代会預备會議小組討論时，王造时动議，提出三点建議，要求市人委轉呈中央。其中第一条建議是“必須提倡法制精神，养成干部守法習慣，随时糾正違法行为。”

1956年7月26日上海市政协政法組第五次會議，王造时在会上問：“反革命分子本人及其家屬对律師辯护制度是否都了解，希望有关部門广泛宣傳。”

---

5. “美国的民主是虛偽的，但法治是認真的。”

---

“我覺得美国的民主是虛偽的，但法治是認真的。美国的法治精神有某些还是有可取之处。”

(1957年6月在市政协及上海法学会所召开的政法座談会上回答王容海提出的四个問題)

右派分子孙大雨在上海市政协會議上誣蔑許多共產黨員和民主人士是反革命份子，以後自稱可以不負法律責任。王造時同意此說，認為“在資產階級國家議會上講錯話，是不負法律責任的。”（1957年6月18日解放日報）“我以為中央負責同志可以考慮再發表一個比較具體的聲明，保證除現行反革命分子之外，一切思想問題不在追究之列。”（1957年5月1日光明日報）

---

6. 把政协的視察工作  
擴大為類似御史制  
度，享有獨立和公  
開的彈劾權。

---

“我覺得這個政策（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儘可以擴大到人民團體。……”

“中國古代的御史制度享有獨立和公開的彈劾權，在歷史上曾經發揮積極作用。也許我們可以考慮把協商委員會已有的視察工作擴大為類似御史的彈劾權。就協商委員會的機構內，創立一個相當的制度。這不但可以具體而鮮明地充實了互相監督的作用，而且還可以間接培養和發揚中國歷來士人氣節的優良傳統。”

（1957年5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屆四次政協會議上的發言）

“官僚主義本來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產物，不過社會主義如果中了它的遺毒而不加以肅清，那麼它所造成的損失和帶來的危害就特別來得大了。……黨中央和毛主席有鑒于此，為防微杜漸，特於去年宣布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這雖然主要指的是黨派間的關係，我希望將他擴充到各人民團體、各機關、各企業、各農業合作社及各基層組織



中去，我体会，这是民主生活进一步的扩大。照發展到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个政策已起了相当好的作用，但也还存在一些問題。第一是有顧慮。‘知無不言，言無不尽’和‘言者無罪，聞者是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容易。拿一个或許是不倫不类的比喻來說，作唐太宗固然不易，作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虛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業有高度的忠誠，更易忧畏譏讒。我想，現在党内各級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还嫌其少。第二是不了解事实，很难提出批評和建議。……因此，我覺得在可能範圍內，應該提供一些事实和資料，与羣众协商討論。如果在这些地方，不搞些小民主或小小民主，那么等到鬧成大民主，就麻煩了。”

(1957年1月在全国政协会議上的發言)

---

7. “上海的老法学家很多，冬蟄已久，現在應該响应党的号召，爭鳴起来。”

---

“重視法治以后，將來国家須要法学人才的数量必然越来越多，要求的質量必然越来越高，

因此从目前起，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法学人才的培养与安排問題。……上海的老法学家很多，冬蟄已久，現在應該响应党的号召，爭鳴起来，对于現在立法工作和司法制度有什么意見或建議，尽管提出積極帮助政府来解决各种矛盾。”

(1957年5月21日在新聞日报举行的法学家座談会上的發言)

## 二、对官僚主义的看法，“必須把整風的重点放在基層”

---

1. 拿望遠鏡看主要的成就，拿顯微鏡來發現工作中的矛盾。

---

“我覺得，我們一手應該拿着望遠鏡來高瞻遠矚，看清大勢的趨向，肯定主要的成就，比照過去的落后，展望未來的远景，

從而使我們滿懷信心，向社會主義前途邁進，不致因為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迂迴曲折而感到迷惑；另一手應該拿着顯微鏡來發現我們工作中的矛盾、困難和缺點，或在未形成的時候加以預防，或在萌芽的時候加以消除，或在已發生問題的時候加以解決，以免由無變有，由小變大，招致不需要的損失。毛主席指示我們：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可以轉化；人民內部矛盾關係，如果處理得不好，也可能轉化為敵我矛盾關係。”

(1957年1月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的發言，或見1957年3月20日人民日報)

---

2. “學校辦成這個樣子，學生早就該罷課鬧事。”“從北京到上海到內地，辦大學都在混。”

---

“復旦大學是否辦好了？我看很慚愧。旁的大學也差不多。學校辦成這個樣子，學生早就該罷課鬧事。為什麼學生沒有這樣

做。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巨大成就，樹立了威信，所

以學生諒解。但這樣下去很危險，不能保證將來不鬧事。所以我認為整風是完全必要的。學校黨委對高等學校不熟悉，但黨外人士是熟悉的，為什麼不向黨提意見讓他錯下去呢？對黨內同志要責備，對黨外人士也應責備。有許多措施，我們心里不贊成，但不說；黨外人士，特別是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外人士對這是有責任的。有職就應該使用權力，不能尸位素餐，敷衍馬虎，只求維持地位而已。這樣國家大事如何搞得好的？現在有些人還是粉飾太平，越這樣下去，越不得了。從北京到上海到內地，辦大學都是在混。現在有所謂‘吃黨飯的’，中國共產黨先烈們投下大量‘資本’，但靠吃黨的歷史的飯，吃下去，是會吃光的！”

（1957年6月6日在復日大學歷史系教授講師座談會上的發言）

3. 官僚主義“普遍存在”，“越往下層，越是專橫，違法亂紀的事情也越多。”

“今天官僚主義，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剛剛萌芽，而是發展到相當惡劣的程度；一般說來，越往下層，越是專橫，違法亂紀的事情也越多。它阻礙了我們的生產進展，影響了我們的建設計劃，損害了我們廣大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官僚主義者的行為，不管是有心或無心，實際上等於假借黨的威信和國家的名器，作了害黨害國的事情。正如周總理所說，官僚主義在黨與羣眾之間築起一座牆，挖了一條溝，弄得愛國愛黨的人，儘管滿腔熱誠，想為社會主義

建設盡其一磚一瓦之用，可是莫名其妙地被擋在牆溝之外，  
淒惶失所，想不到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國家有前途而個人沒有  
出路。”

(1957年5月在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上的發言)

4. “越到下面，越不敢  
放鳴，越不知道如  
何放鳴。”“哪里最  
沉寂，哪里的官僚  
主義就可能最瀰  
漫。”“放鳴的重點  
必須放在基層單位  
和基層羣眾上去。”

“‘放’‘鳴’不是發牢騷，是對  
官僚主義開刀的第一步。……我  
們中間還存在着顧慮。特別是基  
層幹部有沉重的顧慮；基層的羣  
眾有更沉重的顧慮。到今天為止，  
來自基層的呼聲，還是稀少而微

弱得可憐。我們難得聽到成千成萬的中小學教師和學生的呼  
聲；我們也難得聽到各機關小職員各店舖小商人的意見；尤  
其是我們還難得聽到千百萬的工人和農民的心頭話。今天我們  
可以摸出這麼一個放鳴情況的規律，就是越到下面，越不  
敢放鳴，越不知道如何放鳴；越到鄉村，越不敢放鳴，越不  
知道如何放鳴；也就是說，哪里最沉寂沒有聲音，哪里的官  
僚主義就可能是最瀰漫。因此我認為：從中央到地方，從城  
市到鄉村，我們應當把這放鳴運動及時推行到人民生活和生  
產各部門的基層單位上去。……我還深深覺得問題不僅僅是  
把運動推行到基層單位，而是從作為整個運動來講，放鳴的  
重點必須放在基層單位和基層羣眾上去。這不但因為基層羣  
眾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論理應該受到注意；更重要的，在  
基層里牽涉的面最廣，事最多，情況最複雜，本來就不容易搞

好；而不幸基層的干部，一般說來，水平較差，官僚主義犯得也就特別厲害，羣眾生活和生產上所受到的損失和痛苦也就來得特別深，特別重。由於文化水平的限制，基層羣眾有苦說不出。基層的矛盾不揭露，不解決，其它的揭露與解決都是表面的。因此我要鄭重再重複說一句，重點必須放在基層單位上去。”

（1957年5月在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上的發言）

---

5. 要求讓大學教授去支援中小學鳴放。新聞記者下廠、下鄉、下外縣，替千千萬萬有苦說不出的勞動人民訴說他們的心情。

---

“發動基層的放鳴也須要我們大家的幫助和鼓舞。因此我建議：

（1）在基層里必須切實執行毛主席的指示，由高級的第一書記親身出馬指導，並會同有關的高級黨政負責同志，及黨外有代表性的人士組織若干審查團，選定重點，輪流視察，審核。作為一個大學里的教學工作者，我覺得中小學教育是大學教育的基礎，中小學辦不好，大學教育是無從辦好的。在這個放鳴運動中，大學工作者特別有義務，有需要，給中小學的弟兄工作者以積極的支援。（2）有一支生力軍，我認為應該特別加以運用的，那就是新聞界的工作者。我覺得在這次運動中，新聞界的同志們勇敢而切實地做了極可貴可敬的開路先鋒的工作。讓他們在黨的領導下、下廠、下鄉、下外縣，讓春風還吹不到的偏僻角落，可以得到他們生花的筆桿來替千千萬萬有苦說不出的勞動人民訴說他們的心情。”

(1957年5月在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上的發言)

“現在不是爭鳴的問題，而是鳴不鳴的問題。復旦老教授都怕鳴了將來被算總賬。是否由領導方面先表示：思想錯誤，不究既往。”

(1956年7月11日在上海市政协召開“百家爭鳴”分組座談會  
社會科學組上的發言)

6. 發現矛盾尽可能由大家共同解决。解決問題不是憑常識、憑教條，而必須相信科學，相信專家。”

“大家共同發現的矛盾尽可能由大家共同来解决。理由是：  
一、多方商討，可以增加解决得当的机会；二、共同商定也可以分担解决后果責任。因此我建議

兩點：

(一) 進一步發揮統一戰綫的作用，在这次运动的各个阶段中通过各級的統戰機構，動員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力量來切實參加審核这次各方所提供的資料，并共同磋商解决的方針和办法。

(二) 認真听取并采用專家研究的成果。許多問題不是憑常識，更不是憑教條能解决。須要的是細致的科學研究。我們要相信科學，相信學問，相信專家——特別是本國的專家。不但在自然科學方面，尤其是在社會科學方面（例如政治學，包括行政管理學、法律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等）如何延攬我們的老成學者，委托他們切實联系各部門的實際，研究并提供方案以備採納。”

(1957年5月在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上的發言)

---

7.“放”和“鳴”需要  
有園地。”

---

“‘放’和‘鳴’需要有園地，我看也可以鼓勵私人辦刊物，因為有些人不願意替趣味不相投的刊物寫稿。辦一些同人性的刊物，不僅自己能‘放’能‘鳴’，還可以彼此‘爭放’‘爭鳴’。”

(1957年5月1日光明日報)

---

8.“放了花，為的是要  
結成果。”

---

“各位同志和朋友，我們放了花，為的是要結成果。我們此後結果不結果，不但全國人民都迫切期待，全世界的人也都在密切注視着。我們絕不可變成無果之花，在黨的培護下，我們必定要做到朵朵的花都結成好好的果。”

(1957年5月在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上的發言)

# 右派分子陈仁炳的言論

(摘录)

## 一、“治安策”

“我們可不可以說，目前的大問題仍舊是如何鼓勵各方面基層的羣眾打破一切顧慮，在每一個角落里特別是不不少的死角里鳴起來放起來。”

“我還有這麼一個感覺：這幾天聽到的鳴和放恐怕還只是上海各個角落應該鳴應該放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是不是還有很多東西上面的蓋子，還沒有揭開？是不是還有人在那裏壓制批評，遮掩錯誤？例如，昨天我們聽到的中小學教師的長期以來不得解決的忙亂問題，可怕的健康問題，令人痛心的黨羣關係問題，等等，我就感覺到非常沉重，難過。”

“漢朝有個人叫賈誼。賈誼曾經向當時的皇帝上了一篇文章叫做治安策，拿今天的語言來說，他裡面談的都是當時社會政治內部矛盾問題。賈誼把他的材料排了個隊，哪几樁是令人痛哭的，哪几樁是令人流涕的，哪几樁是令人長太息的，又有哪几樁是叫人感覺很不合理的。今天，在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本質上當然完全不是那樣的一些問題。但是，我在聽大會發言的時候，也不知不覺地把我聽見的各種情況在那裏排隊。我不敢一定說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們長太息的事情恐怕是實在太多了。……在某



个角落里宗派主义很严重，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我誠懇希望通过这次整風，我們能比較徹底地解决一些人民内部重要矛盾，扫清党羣团結的障碍，消灭那些可以痛哭流涕和長太息的毛病，化一切消極因素为積極因素。”

（以上均引自1957年6月9日解放日报，在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上的書面發言）

“我認为，在今天若干崗位上，不健康的党羣关系固然一定会妨害鳴和放，但是如果不开始爭取鳴起来，放起来，这关系就永远沒有改进的希望，反过來說能先在党羣关系上，具体的解决几个問題，作几件使羣众信服的可能做的事情，也可以自然地解除了放和鳴的顧慮。”

1. “樹木立信”

“部分羣众在过去可能有过这样的一种不幸的經驗，对于某些犯严重錯誤的黨員干部，提了多少意見，还没有动他一根毫毛。后来，你說这个人經驗主义也罢，他自然免开尊口了，不去自找麻煩了。”

“古时候有一个商鞅樹木立信的故事。我向党提出，在整風的过程中，最好在不太晚的阶段里，把羣众認为有显著錯誤的問題人物，挑几个出来，进行有效的、公道的教育和处理，这对于鼓舞放，会比几篇解放日报社論还更有說服力量 and 动员力量些，当然我不是說社論沒有它的作用。”

（以上均引自1957年6月9日解放日报，在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上書面發言）

“有人建議市委宣傳部將最近三、四個月來各報上爭論問題查一查賬，有許多是不了了之，有許多則以教條主義結束。以教條草率收兵的，好象四平八穩。教條可作擋箭牌。如面對現實，可能就搞得不能下台。”

(1957年4月15日在市政協時事政策學習小組上的發言)

## 2. “算舊賬”

“我還有一個看法。我以為在檢查缺點，明辨是非，糾正錯誤的過程中，舊賬不是不可以算的。有的犯了錯誤的同志，最喜歡用反對算舊賬來遮掩他自己的錯誤。只要我們的動機正確，為了黨和祖國的前途，而不是為算賬而算賬，不是一種‘算賬主義’，那為什麼不好算呢？”

## 3. 對黨內幹部政策的“誤會”與“應注意的問題”。

“再其次，我以為今天羣眾對於黨的黨內幹部政策，是有一種誤會的。也可能黨在這方面，確有應該加以注意的地方。那就是說毛主席多年倡導的治病救人的道理，反對單純懲罰主義的正確原則，是不是在執行中有偏右的情況？是不是可能由於過分強調治病救人而弄到在某些具體情況中無賞罰、無是非，只有姑息而無嚴格紀律？這可能只是我作為黨外一個知識分子的一種過慮。近來各方面常聽到黨內同志受獎表揚多而批評很少有份，是否事實？我以為，懲罰主義是不好的，但今天搞好黨羣關係的關鍵問題之一恐怕是一個認真執行紀律性的問題，在同樣情況的錯誤之下，黨員與非黨員應負平等的責任，這也是黨員與非黨

員在法律與工作紀律和財務責任之前應該平等的問題。羣衆心目中的黨員有特權的看法，或者與這一點有關係。”

(1957年6月9日解放日報，在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上的書面發言)

---

4. “同志，你必須改走另外一條道路了。”

---

“我們幫助黨整風的最好方法，就是向這些黨員同志們大喝一聲：同志，你必須改走另外一

條道路了。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今天在不少的大學、中學、機關、醫院、企業里，確實有這麼一種類型的黨員同志，你說他故意把工作弄壞也是冤枉，他基本上是忠心耿耿的，但是，他沾染上了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灰塵。他入城已經好幾年，但是對於無論那一門業務都不大去鑽研。一句話，供給制或者變相的供給制害了他，使他變成一個思想懶漢。在社會主義之下，一個黨員再不努力一些也沒有失業的危險，或者反而要連升三級也說不定。”

(1957年6月9日解放日報在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上的書面發言)

## 二、“法制觀”

---

1. 三反、肅反有偏差、錯誤，就是因為不少黨員不是從人身不可侵犯、社會主義法制觀出發。

---

“為什麼現在大學教授談起肅反、三反、五反感情還是不服？這些運動中的偏差、錯誤是那里來的？就是不少黨員（不是個別的）根本沒有想到人身不可

侵犯，三反、五反中打人、关人的很多。誰授权这样搞不曉得；隊長認為要怎样，就可以怎样，事后最多来一个檢討。如师大搞肃反时，有一个姓徐的（徐怀啓），只根据他內侄对他的檢舉，把他軟禁了几个月，直到現在沒有人感到不对，連他本人也沒感到不对。我就感到不对。我記得土改、五反紀律中都有一条：不許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但每次違反紀律的不是个别的。就是領導上提这条紀律的出發点也主要从政治影响不好上提，而不是从人身不可侵犯、社会主义法制观点上提的。因此好多黨員干部違反紀律事后檢查‘啊呀！政治影响不好。’很少有人說破坏人身权利、侵犯人权。为什么現在有的人不敢放？就是今天尽管和風細雨，明天来一个狂風暴雨，打虎队把我隔离起来、誰保障我？你們民主党派負責人好办，我們人微言輕誰管我？我找誰去？”

（1957年5月6日在市一屆四次政協預備會議小組上的發言）

---

2. 領導上“沒想到艺术工作者也是公民，也享受宪法对于休息权的保障”。

---

“問題是：为什么像（一）若干劇团的‘办公’制度，工作負擔太重的問題；（二）中、小學教师工作負擔过重，劳动時間过长，忙乱未能克服的問題，長久未得解决呢？为什么他們沒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呢？”

“事实使我感觉到，問題还不是关心人不关心人，或說不不仅是关心的問題，而是一个認識的問題。所謂‘办公’問題，主要是由于負責人沒有区别地对待艺术劳动而来的。同

时，也是由于沒想到艺术工作者也是公民，也是享受宪法对于休息权的保障。同样，对于中学教师的業務，有的領導上似乎認為是没有什么足以輕重的。这又是一个認識的問題。認識既如此，也就談不上对于業務好的教师的任何特別关心了。”

（在1956年8月市一屆四次人代大会上的發言“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

“教师忙乱問題等一大堆問題，为什么每次會議都有人提出？要說政府不努力解决是冤枉，那么为什么現在还存在而且很严重？有許多根源挖得不够，还是限于罗列現象本身。根本問題是关心人不够。对人的本身权利从共同綱領到宪法提了不少，但領導上布置工作时沒有好好考虑這個問題，特別許多黨員在战争环境中長大的，当时也还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但到了城市以后，对人身自由和人的权利不大考虑。例如楊秀峯部長到上海，在文化廣場作报告，大家很早从学校里出来，搞到晚上七、八点鐘才回家。一个人的休息权是做人的起碼权利，應該考虑。”

（1957年5月6日在市一屆四次政协預备會議小組上的發言）

### 三、“兩点論”

“兩点論运用起来，可能就是八股的方式。”

“分析一下目前存在放和鳴的顧慮，不外乎以下六点：

……四、怕所提的意見不全面，反被領導上拿‘兩点論’来加以駁斥；……。”

我以为，在今天，为要达到鼓励放和鸣的目的，党领导方面有必要在群众中建立这样的认识：党和政府是有决心貫徹整風的，提意見虽然應該尽可能的多面，全面，但決不怕片面。在整風中是應該着重鼓勵人發掘缺點和錯誤的，決不要拿‘抹杀過去成績’的帽子往人家頭上戴。”

（以上均引自1957年6月9日解放日報，在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上書面的發言）

“我覺得，在目前要达到‘拆牆’的目的，還需要先做無情地挖牆腳的工作，也就是說，要把這塊‘牆’從基礎挖掉若干築成這塊‘牆’的東西，其中一種主要的‘建築材料’就是部分黨員的驕傲自大，一貫自以為是的作風。在最近幾個月里，若干黨員負責同志在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的問題對於自己在以往的某一些工作、某一些事業存在的缺點和錯誤作了檢查，承認有缺點有錯誤，這是好的，這是‘拆牆’工作中鏟第一鏟土的工作，我們熱烈的歡迎這樣做。但同時，我還是感覺部分黨員同志在這樣做的時候，基本態度還是不虛心的，還是前一半認了錯，後一半又連忙把錯誤推開，把責任卸掉。這樣扭扭捏捏的‘拆牆’是難于達到目的，恢復黨外群眾的信心的。”

“我認為，在若干具體工作方面，實事求是地坦白承認錯誤，虛心檢查缺點，是改正錯誤糾正缺點的先決條件，是改善黨羣關係的必走的第一步。在這一點上暴露不虛心不耐心听取羣眾批評，羣眾意見剛一露頭就出來‘解釋’，‘說明’，

其結果只有在已有的‘牆’上又加上几塊新磚，使得这垛牆平白地又增高了几寸。”

“我默默地視察，在最近几个月当中，上海文艺工作若干部門的領導方面，表現了一种不太健康的拒絕承認錯誤，或是先承認了一些，馬上又对缺点和錯誤进行掩飾和辯解的作法。关于电影方面掀起的各方面的批評和有关的文艺和电影領導方面的某些同志就表現不虛心，以‘官官相护’的态度来对待存在的問題。”

“本次中共宣傳工作會議上，上影的負責人又作了發言。从報紙的登載，我所提到的对于缺点和錯誤半承認半不承認，或者說又承認又不承認的态度似乎还是貫串在發言的精神之中。譬如，承認了过去‘有事不和羣众商量’，‘对羣众信任不够’，‘对羣众疏远’等等，好像是够虛心的了，但在开宗明义的时候先說明忠心耿耿的苦衷一番，說明当初如此如此是怕羣众的意見会‘造成不良影响，会影响七年来的成績’，甚至于会‘脱离工农兵方向’！这是不是在‘檢查’錯誤的时候反而先对羣众講一番人人皆知的大道理？羣众难道是那样地缺乏常識和爱国感和解放光荣感，会因为对上影提了批評就把‘七年来的成績’忘干净了？会因为对上影提意見而‘脱离工农兵方向’？上影的党領導有什么根据而把羣众估計得那样低呢？这样的‘檢查’，我認为是等于对羣众宣告：‘我虽然錯了，但我出發点还是正确的’。这样，其实並沒有触及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真正根源，因为缺点和錯誤并不就是

‘忠心耿耿’产生出来的。……”

“柯庆施書記号召党内同志‘放下架子’，我想大胆地再加上四个字：‘撕下面子’。在对待自己的錯誤上，虚心一些，再虚心一些。勇敢承認錯誤和改正錯誤，本来是我們每一个人應該向共产党員學習的一种美德。同时，我只举了一方面的例子，是不是在高教、小教、科技和其他方面的‘拆牆’工作，也可以考慮上面提到的一些問題呢？”

（以上均引自1957年7月11日解放日报陈仁炳“虚心些，再虚心些”一文）

---

## 2. “兩点論产生付作用。”

---

“民主党派几年来不会走路，現在剛会走路，难免有些毛病，希望党能耐心帮助我們。目前是否

多鼓励大家批評，少提倡反批評为好，我認为这次人代会上批評少，尤其是高教界代表的批評更少，可能是受了柯書記在政协会上講話的‘兩点論’产生付作用。‘兩点論’是正确的，但是也可能产生两个結果：一个是随便什么事情，总是先肯定优点，再指出缺点，变成了教条八股，公式化，另一个結果，也可能因此更加顧慮自己所看到的是否片面，怕自己提的問題是‘一点論’，給人家反批評，还是不批評的好。檀香扇、鷄鴨問題提出后，有关部門作了反批評，我很有反感。有些人以反批評的方式來說明那些对，那些不对，假使他是當事人，我就認为不公平，我不承認他是代表党的意見，反批評是对的，但应耐心的对待我們的幼稚病。”



(1957年1月15日在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三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 四、“跟共产党斗争”

1. 对阶级关系、政权  
机构、统战组织、  
人事部门的看法。

(1)“一张桌子四条腿”：

“陈仁炳的这些错误言论不是偶然的。解放以来，他常常发表某些荒谬的言论。比如，他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说成是‘一张桌子四条腿’。又例如，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代表中共市委和上海各民主党派经常保持着工作上的联系。可是最近有一次，我在参加统战部所召开的座谈会上，却听见陈仁炳发出如此的怪论，他质问：‘统战部的性质、任务、作用、在党内的地位究竟是什么？’他很藐视地说：‘有人说，统战部是个电话总机，我看确实是这样。’”

“在他所主持的上影厂盟员和部分群众参加的五次座谈会中，他用和党敌对的情绪来挑拨群众对党不满，对党怀疑。他用尖刻讽刺的口吻向群众说：‘党对自己的儿子(党员)总是轻轻拍的，对别人就不是这样。’他对个别群众把积极分子看成党的‘坐探’的错误说法，一再在群众中提出说：‘坐探’，不怪这样说的人，而是党的问题……。他不相信中共上海市委公正地处理上影的问题，硬要把座谈会的材料和建议，直接反映给党中央，他决定有关上影厂的四个建议不寄给上

影厂党委，而且这四个建議的送出，也不征求盟的主任委員的同意。”

（1957年6月15日解放日报覃汉川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陈仁的錯誤言行）

“目前民主人士有作客思想的情况相当普遍，克服这种情况，实行相互监督，必須認識到不仅領導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也是参加执政的。分了主客就越客气，以工人階級为領導不等于仅仅是工人階級掌握政权。应当从四个階級都参加政权，都是国家的主人翁这点来理解，否則很困难。”

（1957年2月5日在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負責人座談会上的發言）

## (2)“監察機構打蒼蠅不打老虎。”

“我国执行机关从中央到地方有正規系統，分工明确。但批評糾正錯誤环节最不明确。政府工作上有錯誤，严格講只有監察機構管。但現在有什么問題向人大、政协提，向报館、向党派提，向柯老提，再沒有办法向中国官大到頂的毛主席提，就是不向監察機構提。但是柯老又不是監察長。这样下去不得了。”他認為“所以这样是有道理的。因为監察機構‘打蒼蠅不打老虎’，沒有做过几件大事。”

（1957年6月7日在市政协第87次工作會議的發言）

## (3)“政协做具体工作，党派做思想工作。”

“自从提出监督作用后，我認為政协某些方面应起九十度轉变，如仍反映反映，政协威信將扫地。以后这些會議就不

需要开了。”

(1956年6月29日在市政协第48次工作会议上的發言)

“政协的看法和政府部門的看法可以不一致，政协不要做政府部門‘傳声筒’（在历次政协工作会议和秘書長集体办公会议上的發言）“政协是党派性組織，是代表不同的矛盾，和政府机关的角度不同，主要應該吸收党外被領導的意見，多發掘被領導的矛盾。”“政协工作不能滿足羣众的要求，主要是抓关键性的問題做得不够。”他所指关键是“国家机关官僚主义和羣众不滿的反映，是党羣关系。”

(在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以后的反映，由市政协綜合材料)

“統一实际上是以既定政策来統一。是你(指党和政府)統我，不是我統你。”“監督是第一步。協商結束取得一致是第二步。”“把互相監督作为經驗的第一条，并把它放在今后任务中的显著地位。”“如果協商主要解决政策思想問題，監督就成問題。”“我不同意協商工作最后目的是統一思想，協商工作最后目的是改变实际情况解决实际問題。”“政协做具体工作，党派(民主党派)做思想工作。”

(市政协綜合材料)

“所以提出監督，是由于共产党三个主义严重。自己不能解决，不得不叫民主党派帮忙。”

(市政协綜合材料)

(4)“从党的領導來說避免以外行領導內行。”“可以撤銷各大学与教务处平行的人事处。”

“为什么要長期共存？一方面有一羣人很高明，深且博，但思想方面旧的殘余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另一羣人，一般共產黨員，党性很強，但文化和科学技术差。解放后必須把这二方面人融合起来，知識分子須經過無产階級化过程。从党的領導來說，避免以外行領導內行。我們看到各部門，特别是高教部門，实际上領導权在党方面，这是正确的。各校人事部門、出版等权都掌握在黨員，他們年青，党性強，但文化知識水平赶不上出版原著人。”

（1956年6月29日陈在政协第48次工作會議上討論“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时的發言）

“各学校教授对大学人事处大有意見。所以我那天在统战部座談会上談：可以撤銷各大学与教务处平行的人事处。不过，現在一个問題是各大学却要撤去教务处。我的意見：大学与机关应分別对待，大学不能机关化。今天大学人事处的职权，有許多应是教务处的。”

（1956年10月17日在市政协第13次秘書長集体办公會議上的發言）

---

2. 發展民盟組織，成为“在知識分子中一个比其他民主党派人数都要多，包罗的人才多，質量高，面也广的一个政党”；“尽可能把各党派的領導同志包括在市人委的名單里”。

---

“他对發展組織最積極，但对巩固組織，教育盟員却很消極；他要求盟員愈多愈好，他不惜卑躬屈膝地去拉攏某些代表性的人入盟。好些同志批評他是不顧質量的

大發展思想，是‘名牌主義’。在發展組織中，他一点也不照顧各民主黨派的分工，屢次挑撥同志們反對民主黨派的分工的協議，企圖通過發展壓倒其他兄弟黨派。他常常大言不慚地說：‘民盟是中共以外的第二大黨’。因而，他對於其他兄弟黨派是蔑視的，看不起，以致引起民盟和其他兄弟黨派關係的不和諧。他還洋洋得意，企圖用夸功來得到常委會更多的支持。他說：‘上海盟組織以這樣少的幹部做這樣多工作，簡直是奇蹟。’大家想想，陳的狂妄到了什麼程度？這些事實不能不使人懷疑，陳仁炳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的。”

（1957年6月15日解放日報重慶漢川“揭發和批判陳仁炳的錯誤言行”）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大家的看法不一致是有的，但陳仁炳的看法則是突出的。我覺得他的看法與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是有些格格不入的，完全是一種‘在朝黨’與‘在野黨’的搞法。柯老對陳仁炳會有些親切的和苦口婆心的意見，但陳仁炳對這些話的看法經常是不對頭的。柯老對報紙上所載一個盟的座談會有意見，但他回答說：‘我們發表的是內容的多少分之一’。言外之意好像還包涵了多少似的。有時他說柯老的話是‘他講他的，我們還是搞我們的’。這些都好像缺少一個共同的立場。為什麼要這樣呢？我想長期共存不是這樣搞法的。”

（1957年6月15日解放日報尹大賄“揭發陳仁炳的錯誤言行”）

“我有濃厚的第二黨思想的，即希望民盟成為中共以外，在知識分子中一個比其他民主黨派人數都要多，包羅的人才多，質度高，面也廣的一個政黨。”

“偌大一個上影廠，光演員就有二百多人，而盟員只有七個，要大力發展，越多越好。共產黨要進步的人，我們只要中間落後的，入了盟不過組織生活，不交盟費，不寫自傳都沒有關係。要強調組織獨立，政治自由、做一兩件代表羣眾利益的事跟共產黨鬥爭。”

（1957年7月11日解放日報）

“陳仁炳一方面親自用拉攏、請客、登門拜訪等手段吸收‘名牌’和對黨心懷不滿的人入盟；另一方面就處處打擊黨的威信，給自己撈政治資本。陳仁炳指示上影民盟支部說：必須向黨鬥爭，才能在上影建立威信。”

（摘自1957年7月1日解放日報“停止陳仁炳彭文應盟內職務”由王林谷、陶雄、尹大貽等揭發）

“五月二十二日陳仁炳布置各區工作委員會‘鳴’‘放’工作時說：‘鳴放市場早晚市價不同，一、原來說民主黨派成員也參加整風，現在改為幫助黨整風，為什麼？因為怕‘目標轉移’‘金蟬脫壳’，另外是因為民主黨派成員有職無權，三個主義少些。二、整風暫時不到基層，是由於基層[消防]力量不夠。三、市政協會議內容，不同於宣傳會議，加了一個增產節約，是怕黨外意見提多了’。”

（1957年6月19日解放日報“民盟市委為右派所操縱”薛葆康

揭發)

“以政府干部担任市人委委員的应考虑更动。他是人委委員，又是局長。不是以局長身分担任委員，如果他局長的工作搞得很好，但作为市人委委員表現不好，可以老实不客气地更換，工、农、青、妇女也要考虑更动一下，不要老是这几个人。”在另一次会上又接着提出：“希尽可能把各党派的領導同志包括在市人委的名單里。”

(在1956年12月7日市政协第65次扩大工作会议和1956年12月25日第19次常委会上，陈仁炳在协商市人委人选时的發言)

3. “輕磅拳头与重磅拳头”，“治大病用重藥”，“以削弱党的領導为目的。”

“陈仁炳企圖使他的各种荒謬言論去影响和俘虜某些落后的羣众，他就反对反批評，不允許

反批評，尽量用各种办法来阻扰

反批評。他認為‘反批評’的提法是否妥当，也值得考虑。去年和今年初，他曾一再說反批評一开始，羣众就不敢說話了。統战部刘部長在某几次民主党派座談会上作了帶有反批評性質的發言，澄清了好些錯誤的言論，但陈仁炳是很不滿意的。他認為刘部長这一談，别人不敢說話了。同时，他說：羣众的批評是輕磅拳头，党的領導人的反批評是重磅拳头，这样的批評与反批評是不对等的，吃亏的是羣众，这样也就妨碍了民主的發揚。”

(1957年6月15日解放日报覃汉川“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

陈仁炳的錯誤言行”)

“在上影問題上，尹大貽等指出陈仁炳有懲办主义思想，說：‘治大病要用重藥，上海解决不了，就到北京去’。陈仁炳从上影座談会上收集来的材料，有的盟員提出要求再核对一下，陈仁炳不同意，說‘你去核对就有你的片面’。上影材料的整理沒有經過民盟市委常委会的討論，而是陈仁炳大权独攬，一手包办的。最后提出的改进上影的意見，也不肯送一份給上影的党組織。”

(1957年6月15日解放日报“陈仁炳惟恐天下不乱他到处活动和党‘唱对台戏’”)

“陈仁炳是要算帳的，因为他肯定是有报复的，并且要懲办。他公开向盟內盟外同志表示上影的問題是‘治大病要用重藥’。他还肯定了有些同志所說的上影提意見一定要报复，他說这是以他人民代表視察的經驗証明了的。于是他事先‘防止’了，他不願意把材料送一份給上影党支部（虽然連陈毅、周揚也送的），以后是送了，但改进意見仍不送給上影党支部。他大致認為上影只能由上級来懲办，是不能与他們談改进的。”

(1957年6月15日解放日报“再揭發陈仁炳的錯誤言論”)

“我在座談会上和座談会后是散放了我的懲罰主义的，也就是‘治大病用重藥’的荒謬主义，这是以削弱党的領導为目的。”

(1957年7月9日陈仁炳書面交代“关于上影五次座談会”)



# 右派分子楊兆龙的言論

(摘錄)

## 一、对党的領導党羣关系和工農干部的看法

1. 法律界矛盾“主要存在于党与非党之間。”

“法律界过去有矛盾嗎？無疑是有的。……初看起来，它似乎主要存在于年輕的和年老的法

学家之間，或者說得直爽一点，在进步的和落后的法学家之間，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它主要存在于党与非党之間。过去的司法改革是有一定的收获的。可是改革的結果，將大批非党的司法工作人員(尤其是审判人員)調出司法机关之外。……这些人中，一小部份是年老的，大部分是少壯者和青年，他們都是解放后被留用或录用的，……一般講来，政治上没有什么严重問題。……他們的作風也并不見得都是坏的。……他們过去办案或做其他司法工作并非都是毫無成績；很可能，在今天看来，他們工作的質量，在某些方面还是今天司法机关某些在职干部所不及的……可是他們的命运已註定和人民政权下的司法工作絕緣。……司法改革后，在职的司法干部中有一部份也是‘旧司法官’或‘旧法’出身的；他們是黨員，解放后就担任司法部門的总的或部門的領導工作。如果司法部門在司法改革以前有毛病的話，主要的責任應該由这些同志負担。这些同志的業務水平有的固然很高，但有的并

非如是。至于他們的政治水平？……是比一般的党外人士高一些。但这些情形是否就足以說明他們和被調出去的党外人士相差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前者可以担任司法部門的領導職務，而後者只能改派到火葬場、醫院等處去當雜務呢？顯然不是。此外，司法改革後，在職的幹部中有不少是解放後從各大學法律系畢業的非黨青年，法律業務有一定的基礎，中文也有相當水平，可是好多年來一直沒有機會提升為審判員。而有些領導他們的黨員審判員或審判長等却有時既不懂法律，而中文水平也很低，甚至連獨立寫判決書的能力都沒有。”

“院系調整的結果，……在這些新成立的政法學院中，除在北京有一部分被併學校的党外教授參加上層領導外，其餘大多由黨內幹部擔任行政及教學領導，党外教授參加上層領導者幾乎完全沒有，而擔任基層行政及教學領導者，也非常之少。……1954年，有幾個綜合性大學恢復了法律系……在這次恢復的法律系中，有的在領導方式上採取了幾乎是清一色的，從行政到教學的黨內幹部領導制，在教學工作的分配上，基本（當然有少數例外）採取黨內幹部及年輕助教或講師教課制，……對其餘的教師（尤其原來在別的学校）一律擋駕。……過去那種寧可信任不懂或不大懂法學的少數幹部，而不敢放手使用專門研究法學的党外人士的看法是很成問題的。”

（以上均摘自1957年5月8日文匯報“法律界的黨與非黨之間”）

“未作詳細調查而把中国的法学家，尤其老的法学家的能力和水平估得很低；实际上这是一个对某些法学家信任与否的問題。”

（摘自1967年5月9日新聞日报“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不頒佈？”）

2.“党团员鼓励有方，要你提意見，讓你狗咬狗”。“党员沒有独立思考，光奉命办事，…如小媳妇出身的婆婆，虐待起人来更厉害。”

“本人写文章有些創造性，党支部書記写文章戴我个修正主义的大帽子，我这个剛翻身的教授，实在吃不消。还有，青年教师把老教师到底当作什么人看？当普通人，特种人，或是快要死

的人？这几年优待些肉吃算了呢？或是你还有十年好活先給草料吃吃。这样对人太不人道，太殘酷。……理科教师也不要神气，十年之后紅色專家出来会接替，已有党员干部不小心流露出来，这也很殘酷。在軍代表接收学校后，非党老教师的团结就成問題，因为党团员鼓励有方，要你提意見，讓你狗咬狗，这种情况到肃反时达到高潮。党的制度也有問題，民主集中制，事实上只有集中沒有民主，党员沒有独立思考，光奉命办事。这种作风帶到系里来，就如小媳妇出身的婆婆，虐待起人来更厉害。”

（摘自1967年5月在校党委召开的教授座談会上的發言）

“过去科学水平差，从政法学院的院長、教务長算起，都是些什么样出身的人，乱七八糟的。我們老教师不能开课，

需要准备一个时期。而不懂法学的老干部却看了一个月的書就去講課，很难想象。”

(摘自1957年5月在法律系座談會上的發言)

## 二、对社会主义建設成績，特別是对我 國法制的估价

### 1. 我国“無法可依”

“使坏人感到無所顧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

“專靠大家的革命法律意識或社会主义法律意識或大家从經驗實踐中慢慢地創造出的新的規範來解決問題，那就不知要等到

什麼時候才可以有一套比較完整的、統一的、明確穩定的法律出現，那就要使法律制度的發展大大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設的要求，就要造成法律制度和各種建設事業的脫節。……我們過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實在跟不上實際的要求。例如，平常與人民的基本權利的保障及一般社會的調整最有密切關係的刑法典，刑事訴訟法典……至今還沒有頒布。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違法的，什麼不是犯罪，什麼是犯罪，以及應如何處罰等等，在好多場合，一般人固然無從知道，就是偵查、檢察、審判人員也沒有統一明確的標準足資遵守，這就使得我國法律制度的建設，在整個的社会主义建設中，變成了最薄弱的一環。……上述這些法律的不及時頒佈及大家不能於事前在這方面得到應有的教育。因此就發生一些無根據的控告和不應該有的錯捕、錯押、錯判的情況。無論在刑事或民事

方面都难免使坏人感到無所顧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因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这些情形在干部水平较高的大都市固然常常發生，而在水平不高的地方尤为教見不鮮。……我們过去只偏重于制定有关于政权机关的組織及一般职权的法規和某些行政法規，而沒有及时地兼顧到上述这些法律，这不能不說是一大損失。……在过去的七、八年中既沒有及时地頒布过一部完整的法典，又沒有設法弥补这个漏洞，（如由主管部門頒布一些有系統的条例的規程等，）使許多事情長期沒有法規可以遵循，因而造成某些混乱現象，这不能不說是一种严重的事态。……某些重要法律迟出来一天，在六亿人口的中国会使多少人遭受多大的損害。”

（摘自1957年5月7日新聞日报，楊兆龙“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不頒布？”）

“我国某些重要法典不及时完成頒佈，会不会成为制造不安与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兩点是可以肯定的，（一）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必須要有一套基本完备的，政府与人民共同遵守的法律……否則政府可以随便行动，而一般人民却苦于無所适从；政府机关内部可以有几百几千种的指示、办法、总结、規章……而一般人民却知道很少，政府机关的人員即使胡作非为，一般人民也無法判断有無法律根据；这种違反民主与法治的基本要求的情况是足以导致人民的不滿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二）过去几年来所發生的錯捕、錯押、錯判、錯执行等事故以及一般行政机关的錯誤措施（無

法可依)或‘無完備精確的法可依’實際上有很大的關係，這已經在人民中間造成了相當不安以及對政府的懷疑。”“我國雖然頒佈了一些法令，但婚姻法不適用，其中十七條有問題，懲治反革命條例以及其他法令等等不適用。”

(在新聞日報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

“我們沒有行政訴訟法院，現在人民對官僚主義有怨沒有地方告。”

(1957年6月8日在民盟市委座談會上的發言)

2. “不能說成績是基本的，錯誤是次要的”；“要檢查一下歷次運動的合法性，尤其是肅反運動。”

“我們國家外交和內政有人說很好，究竟好不好，在整風以後就能明白了。”

“我們的人事管理只管歷史、

鑑定、評薪、評級、搞得一團糟。”

(1957年6月8日在民盟市委座談會上的發言)

“院系調整時本人不敢來復旦，以為復旦馬列主義水平高。現在看出來，這不是馬列主義，而是教條主義。”

(1957年6月3日在校黨委會召開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

“有人說，我們系(法律系)是學‘人大’來的，其實我還不是在學‘人大’；而是學政法學院，因為崔主任是從華東政法學院來的，他對法學並不是很精通的，因此，照搬政法學院的一套，而政法學院的這一套又是從中央政法干校來的，因此，把復旦大學法律系搞得像個幹部訓練班，而不是大學。過去基礎打得不好，茅草棚的基礎，當然蓋不起鋼骨水泥的

高樓大廈來，因此領導上考慮，不惜放棄過去的基础，從新搞起。”

（1957年5月在法律系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

“解放來歷次運動的成績到底如何？有好有壞，不能都肯定，如法律系，就是本校力得最壞的系，是公安機關、法院作風。所以不能說成績是基本的，錯誤是次要的。…要檢查錯誤，希望大家檢查一下歷次運動的合法性，尤其是肅反運動。”

（1957年6月3日在校黨委會召開的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

### 三、“黨化司法”和法律的階級性問題

---

1. 解放前，司法“不怕黨化，而唯恐其不黨化，或黨化不徹底”。

---

“‘黨化司法’是建立在黨的主義之上的司法……司法當然應該照國民黨的主義去辦理……擔任司法職務者之能了解黨義，為

法律與司法真正黨化之先決條件。易言之，擔任司法職務者，為使司法黨化，固然應該了解黨義，而為使司法制度能發揮黨化法律的精神，也不可不了解黨義。”

“今日中國的司法，不怕黨化，而唯恐其不黨化，或黨化不徹底，我們今后的努力應該是盡量地發揮‘黨化司法’的真精神。”

（1937年楊兆龍“黨化司法”之意義及價值）

---

2. 解放後，“法律是階級鎮壓的工具”。  
這個定義要修改。

---

“法律是階級鎮壓的工具，這一個定義今天是否要改一改？中國今天鎮壓對象只有百分之几，百

分之九十几的人民要不要法律？可見法律又是同一階級內部維持紀律的工具。”

（摘自1957年6月3日校黨委會召開的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

“法律體系內的法律規範，都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主導性或關鍵性的；一類是輔佐性從屬性的。……主導性規範往往只能用於某一個特定階級社會，而輔佐性規範往往可以用於各種不同性質的階級社會。”

“掌握統治權的資本家及其夥伴們不得對進步人民的要求作一些讓步，因此出現了一些對進步人民比較有利的法律。……這些法律雖是資產階級法律的一部分，而在實際作用上它們卻反映着被統治階級的階級性。”

“在這些國家（註：指某些資本主義國家）里當進步力量強大到和敵對力量相等或超過它，而在議會中力量的對比上得到相應的反映的時候，則議會所制定的法律就不可能反映一種階級性。那末在同一个國家里面，在某一個階段，也許一個相當長的階段，包含着兩種或更多種的不同階級性的法律規範。”

“法律規範的本身是有反抗性的，是長期為剝削階級國家的被統治階級用來對抗統治階級的，如承認罷工權的法律。這類法律在剝削階級國家是反映勞動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

“法律中有許多規範的階級性不表現在規範的本身，而表現在誰運用它們或用它們來對付誰。”

（華東政法學院學報1956年第三期“法的階級性和繼承性”）



# 右派分子孙大雨的言行

编者按：孙大雨詆蔑好人反革命的言論是章与罗联盟的阴谋活动密切联系的，为了揭穿它的假象，我们把孙和章罗联盟的关系以及有关活动一併編入。

## 一、孙大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和行动

### 1. 这是什么話？

孙大雨估計中国要出現匈牙利事件

1957年6月7日孙大雨在

复旦党委召开的教授座談会上說：“……很明显的，从匈牙利事件中可以看到，霍尔蒂分子統治了二十多年，他离开以后，留下来的有的混入党内，有的在党外，扩大党和群众的矛盾，使党和群众对立，到那时候，一哄而起，群众就反了党。中国毫無問題，有这样的情况，只是沒有爆發出来。”

（解放日报1957年6月8日）

污蔑党与工人阶级 1952年孙大雨在一次民盟小組会上对一个盟員說：“無产阶级一無所知，所以，共产党沒有了知識分子是無法領導的，既不能領導革命，也不能領導建設。”

（1957年6月27日外文系全体教职員在大会上揭發）

（按：这一論調和章伯鈞、罗隆基的一模一样。）

孙大雨还說：“毛主席不是民盟的主席，为什么要喊毛主席万岁呢？”

（1957年8月22日新民晚报）

孙大雨曾經想拉外文系教授黄有恆参加民盟，黄表示不想加入民主党派，孙大雨就說：“共产党里还不是一团糟！”

（1957年6月27日外文系全体教职員在大会上揭發）

1956年9月孙大雨在上海市政协召开的座談会上說：“現在中共有1070万黨員，發展这样快，質量又这样低，领导全国这样重的工作，怎么能行呢？”

（1956年9月在上海市政协座談会上的發言）

有一次上課，工友忘了給孙大雨擦黑板，孙就大发脾气說：“工人翻身都翻到地下去了。”

（1957年7月5日解放日报“复旦全体工友集会揭發孙大雨仇視劳动人民”）

孙大雨对党团员一直存有戒心。当助教給他提出意見，他就問：“你是不是党团员？”同学到他家中去看他，他也要問：“你們当中有沒有团员？”1956年系里請孙大雨帶研究生，他不肯，事后他对一教授說：“我怎么知道这些研究生不是来監視我的呢？”1955年夏在英文組四年級英国文学选讀的期終考試中，孙大雨有意压低团员刘子翰分数。

（1957年7月17日外文系教师在反右派斗争学习小組会上揭發）

解放后沒有自由 学习苏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文件时孙大雨在小組里說：“解放后民主还听到講过，自由却沒有听到了。”

有一次乘公共汽車，人多排队。孙大雨說：“社会主义革命是好的，但怎么弄得好，是个問題。我們走了弯路，走了

使我們吃苦的路。”

1953年學習尤金“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篇文章时，孙大雨在小组里說：“现在社会变得相当庸俗，家庭什么感情也沒有。”又說：“现在連文字也穿上了制服。”

(1957年7月5日解放日报孙大雨的丑恶叫險)

孙大雨有一次在學習小组里說：“解放以来，开了許多的会，人云亦云，成了党八股。这样下去，我們都会变成白癡。”

(1957年8月20日文匯报)

## 2. 否定思想改造的成績。

思想改造改糟了 1953年有

一次在复旦大学大礼堂听报告，报告中提到几年来的成就，其中沒有提到思想改造。孙大雨就說：“思想改造改糟了。”“搞得不好，所以不提。”

(1957年6月27日外文系全体教职員在大会上揭發)

討論宪法草案时，孙大雨对一位先生說：“宪法上列举了各項大运动，而思想改造不在內，因为思想改造失败了，可見中央英明，知道事情的真相。”

(1957年6月27日外文系全体教职員在大会上揭發)

## 3. 企圖根本推翻肃反运动，建立資产阶级專政。

“肃反运动是肃革”孙大雨曾經对人說：“肃反运动是肃革运动”(意即肃清革命的运动)

(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肃反是打击报复，要处分领导肃反的党的負責人” 1957

年5月孙大雨在写給文匯報一篇文章中說：我現在根据宪法所賦予的公民权利，同时为了党搞好整風运动、也为了党团結許多高、中級知識分子，請求党和政府指定上海市委高教科学部、高教局以及从前华东高教部的实际負責人，連同上海各高等学校当时党委負責人、党支書等，把他們在三反、思想改造、肅反三个运动中的一些情况，分別作出一个詳細具体的書面交代，并加以公布，究竟为什么把有些人作为重点对象？有什么原則？有什么根据？为什么把其他的反动历史彰明昭著的人不作重点？反而有包庇过关的情形？而且就把这批包庇过关的人用作骨干，去打那些無辜的被‘打錯’的人？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死了多少？伤了多少？打对了多少？打錯了多少？打錯的具体情况如何？包庇走漏了多少？那些包庇走漏的人跟上述各高等学校和部局的各方面負責人有些什么政治历史上关系？那些打錯的事件里有多少是报复、打击？报复什么？那些打伤打錯的事件，应当由被害人自己来把交代材料核对，問他們是否符合事实，打錯而又打死的，則由死者家屬来核对。在上述各高校和部、局的各方負責人書面詳細交代时，我建議应当隔离开来生活，不得彼此交換意見，不得接触他人……。”

（按：由于孙大雨一貫坚持反动立場，平时反动言論很多，在肅反运动中，羣众曾对他进行思想批判，但我校党委从未拿他当做肅反对象。即在思想批判时对他也是保护过关的。）

4. 反对教学改革和反  
对学习苏联：

百多年的外語成就給改掉了

1957年4月外文系教师去看孙大

雨，孙对他们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外語教育成就都給这几年改掉了，二十年还不得恢复。”

（1957年6月27日外文系全体教职員在大会上揭發）

1954年度第一学期教研組討論高教部頒發教学計劃时，孙大雨說：“高教部的計劃是几个剛畢業的科員搞的，我保証行不通。”

孙又在教研組說：“就算我是廚子罢，高教都是主人罢，你要菜好了，你要蝦仁炒蛋就蝦仁炒蛋，你要肉絲炒什么就炒什么，但是你不要到厨房里来，命令我加油加醋，做这样，做那样，这样我一样也搞不好。”

討論教学大綱时孙大雨說“老是討論这些东西，我討厭这些东西，这完全是为計劃而計劃。”

（以上引自1957年8月24日解放日报）

学习苏联經驗学坏了，孙大雨曾經对別人表示：“他如果当了系主任以后就要取消学习苏联，恢复英美那套方式，并且要把那些努力学习苏联的積極分子調出去。”他还說：“我們过去学习英文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現在学习苏联經驗学坏了。”

（1957年8月7日外文系教师在學習小組会上揭發）

討論教学計劃时，系內有的教师在發言中引了苏联專家的話，孙大雨就諷刺地說：“你們把苏联專家的話当作聖旨。”当系里在学习苏联中發現了个别的缺点，孙大雨又說：“你

們學習蘇聯學錯了。”

(1957年7月5日解放日報“孫大雨的丑惡嘴臉”)

---

5. 反對學習馬列主義的藝術理論，反對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

---

有一次外文系召開全系大會討論課程開設問題，会上有同志建議開設文學理論課，孫大雨說：

“文學理論課至多不過講講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本小冊子，不必開設”。

(1957年6月26日外文系教師在反右派鬥爭小組會上揭發)

孫大雨教授英國文學課，當同學要求他介紹一些蘇聯文藝批評方面的書籍時，他說：“蘇聯文藝批評不一定高明，犯不着去看。”

(1957年7月5日解放日報“孫大雨的丑惡嘴臉”)

復旦大學舉行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時，孫大雨自己不參加，並且還阻止別人參加，他說：“你去就要發言，一發言就等於捧了他們的場，那你何必去捧他們的場呢？”

(1957年7月5日解放日報“孫大雨的丑惡咀臉”)

---

6. 玩弄兩面手法，發表似是而非的謬論：

---

肅反運動中，反革命分子吳岐，賈植芳被逮捕了，孫大雨就以諷刺這兩個反革命分子的假積極

極為名來打擊所有積極分子。他說：“吳岐到革大學習過，賈植芳也很積極，所以我們對滿口馬列主義和表現積極的人要提高警惕。”

(1957年8月24日解放日報)

1955年全国展开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孙大雨在教研组里说：“社会主义还只有几十年，资本主义学者搞了二、三百年，他们的成果是用劳动得来的，我们不能一棍子打翻。现在过‘左’情绪严重，这是‘左’倾幼稚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

（1957年6月27日外文系全体教职员在大会上揭发）

当学校里展开批判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时，孙大雨又说：“胡适的影响早就没有了，解放前很多人就看不起他。”又说：“胡风是个糊涂蛋，我们这样批判他，反而抬高了他的价值。”

（1957年7月5日解放日报“孙大雨的丑恶咀脸”）

（按：从以上这段话可以看出：孙大雨是企图用一套两面手法来保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孙大雨是一贯否定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肃反运动中，小组里为了堵塞漏洞展开思想批判，大家对孙大雨一贯否定学习苏联这方面提出了批评。后来孙大雨作书面发言，为自己辩护。他说：“我认为学习苏联必须深入细致地考虑正面、反面甚至完全否定的意见。”又说：“学习苏联必须有苏联那样的条件，没有那样的条件，学习是不行的。”

（1955年8月24日孙大雨在外文系学习小组会上讲）

（按：孙大雨是想以领导必须全面考虑各种意见来为自己一贯否定学习苏联辩护，是企图以强调条件为借口来根本否定学习苏联。）

## 二、孙大雨是章罗联盟在上海的右派集团的骨干分子

### 1. 孙大雨与章罗联盟 右派集团的关系

1957年7月5日民盟中央举行整風座談会上，潘光旦揭發了罗隆基小集团，他說：“这个小集团不限于北京一地，在北京的有張东蓀、曾昭掄、潘光旦……。在上海的有彭文应、陈仁炳、孙大雨、赵文璧、周永德、孙斯鳴。”潘光旦說：“罗隆基不止一次地說过北京而外，西南和上海必須控制在手里。……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業城市。……自然是能够夺取到一个好一个。”

(1957年7月7日解放日报，民盟中央整風座談会上潘光旦揭發)

1957年7月5日新聞工作座談会上徐鑄成交代說：“浦熙修一直对我宣傳罗隆基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人。……又說罗最会替別人打算。她給我談了二个例子：一个是孙大雨去年曾来京找罗隆基，結果是罗給他出了主意，孙大雨的思想就搞通了……。”

(1957年7月6日解放日报)

### 2. 罗隆基指示孙大雨 篡夺大教联的領導 权。

上海解放前后，罗隆基在上海和民盟右派分子彭文应、陈仁炳、赵文璧、孙斯鳴、孙大雨、周永德、程应鏐等結成右派小集团，反对民盟的正确路綫，反对共产党的領導。罗隆基曾指示右派集团說，民盟一定不要



使“上海大学教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走入歧途，即不要大教联一面倒，倒向共产党。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0日)

从1947下半年开始，彭文应就在大教联中贩卖罗隆基中间路线的滥调，指示孙大雨夺取大教联的领导。

(解放日报1957年7月20日覃汉川、沈体兰揭发)

据漆琪生在上海市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揭发，上海解放前夕，罗隆基曾打电报给上海的民盟地下组织，要他们在共产党到达上海前，把大教联抓在手里。

(解放日报1957年6月26日)

1948年初大教联改选时，孙大雨曾事先暗地里提出名单，在部分会员中进行活动，要求根据他的名单来选举。名单中除沈体兰外，其余均民盟盟员。此事后为郑太朴所劝阻。

(按：孙大雨一直吹嘘他参加大教联民主运动有功，想以此向党邀功，因此对解放后大教联改选中落选怀恨在心。但是根据这些事实，孙的参加大教联完全是别有用心，群众不选他，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3. 孙大雨等右派分子  
企图篡夺上海民盟  
领导权

陈仁炳在复旦历史系全体教师会议上交代说：“我个人为了可耻的目的，也站在罗隆基的一面

了。在地方上我和彭文应、孙大雨这几年是想把民盟领导权搞到自己手里。”

(1957年6月27日新民晚报)

1952年民盟上海市支部改选时，孙大雨个人事先提出市支部委員的名單，送市委统战部，要求市委统战部送民盟上海市支部，根据他所提名單进行选举，但为统战部所拒絕。

4. 孙大雨等右派分子  
还要另組政党

陆詒交代他們（指陆詒和顧执中）和王造时要想利用恢复“救国会”的名义，来組織一个反动的政党。……陆詒、王造时回到上海后就与孙大雨共商大計。孙大雨嫌救国会名义不好，主張干脆另組政党。陆詒說：“这当然是資產阶级政党。”

（解放日报1957年7月2日）

王造时说过：“孙大雨确曾說，救国会名义不好，不如另組政党。”

（新聞日报1957年7月3日）

5. 孙大雨等右派分子  
向党向人民猖狂进  
攻的策略和陰謀。

分工放火 孙大雨等右派集  
团分子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是  
有綱領，有严密組織和分工的。

他們的分工是陈仁炳抓民盟市委和文艺戏剧界，王造时、楊兆龙抓司法工作，陆詒抓新聞工作，孙大雨、許杰在高等學校放火（見7月2日解放日报）。他們不但研究策略，使用陰謀，而且还互相打气，檢查督促，如顧执中从北京写信問陆詒說“上海鳴放如何？大雨、造时、文应發言沒有？”（見7月4日解放日报）而孙大雨則在6月1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陈仁炳在宣傳會議的發言以后，打电話用英文向陈說：“我恭賀你，你說話了。”其支持陈仁炳到处点火向党进攻的得意忘形

的神情，可以說是溢于言表。

（陈仁炳在复旦民盟支部大会上的檢查）

密謀誣陷好人 王造时从北京回来以后，向孙大雨、彭文应传达了罗隆基的指示，陆詒并告訴孙大雨說顧执中希望他說話“策略些”，孙大雨說：“現在不是提出要帮助共产党整掉三大主义嗎？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起来的說話？”他們这些人都認為这是向党进攻的时机到了。

（1957年6月29日解放日报）

孙大雨蓄意誣陷好人为反革命，在他家里和王造时、陆詒等人商量，王这个軍师替他出主意，劝他“名字可以提得少些，打击面不宜过寬”（見7月3日新聞日报）。陆則除了積極支持他的發言外，还在事后到处替他鼓吹捧場，大叫“精彩。”（見6月18日解放日报）除了王、陆兩人而外，参加討論孙大雨向党进攻，污蔑好人为反革命的还有彭文应、赵文璧、張孟聞、程应鏐这一伙右派分子。他們这些人的反党積極性都使他們忘了疲勞，他們在孙大雨家开会一直开到深夜。孙大雨这个“病人”，在这种时候也沒有病了。当市政协准备成立調查組，处理孙大雨的污蔑發言时，他們又多方面替孙大雨辯护。右派分子王造时还說：“資本主义国家里，在議會中說話不負法律責任。”当天他們在孙大雨家里又密謀到深夜。孙大雨狂妄地說：“开几千人的大会打官司，我不怕，就是上国际法庭，我也不怕。”（見7月2日、6日、13日、18日解放日报）。这些右派分子大概是想要帝国主义来帮他

們的忙了。

根据上述这些材料，这些右派分子是一个集团，而孙大雨是这个集团的一名骨干。这已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了。他們躲在見不得人的陰暗角落里，密謀向党向人民进攻，他們有組織，有計劃，講策略，使陰謀，我們一定要徹底揭穿他們的黑底。

### 三、孙大雨伪装进步，企圖破坏党与 人民内部团结，打乱革命秩序推 翻党的領導

按：孙大雨在解放后曾一貫蓄意陷害一些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及民主人士为反革命，污蔑誹謗，惡意中伤，肆意譏罵，进行人身攻击。其中有高教党委書記，高教局局長陈其五，复旦大学前任党委書記李正文，現任党委書記楊西光，前外文系党总支書記謝受康，外文系黨員助教龙文佩以及党外人士司法部部長史良，上海市副市長金仲华，現复旦大学付校長苏步青，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付主席章靳以，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全增嘏、楊豈深、李振麟、徐燕謀、講師程雨民等同志。

由于孙大雨陰謀篡夺高教領導未遂，自1949年起即向中央誣告某些同志为所謂“公館派”，繼而誣告更多同志为“公館派”、“法西斯”、“特务”、“托匪”和“反革命”，至1955年底孙更扩大其誣告范围，告六十余人為“反革命”。

在此期間，中共上海市委許多負責同志均曾多次與其親自談話，對他說明事實，進行教育，孫大雨不但不知悔悟，反而變本加厲地公開進行污蔑誹謗。其明目張膽破壞人民團結，打亂革命秩序，推翻黨的領導，蓄意陷害好人的罪惡企圖，是十分明顯的。

現將其事實經過摘錄如下：

蓄意陷害國家幹部企圖破壞六億人民的團結 1949年5月上海初解放，大教聯改選，由於孫大雨得不到羣眾的擁護而落選。由此孫大雨對大教聯中的某些人士懷恨在心，開始到處辱罵章斬以、曹未風、漆琪生、李正文等為所謂“公館派”

1952年三反運動開始，孫大雨即趁機報復，說：要搞好三反，首先要搞掉“公館派”，而“公館派”的頭子就是李正文。

院系調整以後，孫大雨誣指楊豈深（復旦大學外文系代主任）和幫助他進行思想檢查的李振麟、全增嘏等為“公館派”。

1953年李正文在有高教部曾昭掄參加的會議上，為了消除成見息事寧人，就關於孫大雨問題作了發言，孫大雨執迷不悟，堅持污蔑好人為反革命。

1954年9月華東統戰部召開的高教座談會上，孫大雨肆意污蔑李正文領導“反動殘余復辟”，“李正文是法西斯”。

統戰部座談會以後，孫大雨曾和新聞系教授曹亨聞說“復旦是搞不好的，復旦領導是陳其五，陳其五的一切是在曹未風的手里，曹會拍馬屁，陳其五糊塗，看形式不看實際，

李正文加入公館派都是曹未風拉的，吳克堅糊塗虫，陳同生是市僧。”

在1955年以前，孫以反“公館派”為幌子，在黨的會議上，在校內校外的座談會上及個別交談中污蔑了陳其五、曹未風、李正文、章靳以、漆琪生、楊豈深、李振麟、全增嘏等為“公館派”分子。在潘漢年問題揭發以後，他將所謂“公館派”分子污蔑為潘漢年反革命集團中的成員，並污蔑前外文系黨總支書記謝壽康為“特務”，外文系黨員助教龍文佩為“托匪”。

孫大雨自1955年10月到現在已經兩年不做工作了。復旦大學外文系請他開選修課他不來，請他帶研究生他不帶，教研組請他領導莎士比亞科學研究小組，他不感興趣，每次會議通知他，他也不來出席，他所關心的只是每月6日來校拿薪水，到古玩市場掏古玩，到文化俱樂部跳舞。現在孫大雨每月領工資302.5元，另外由學校津貼房租160元，共計每月實拿國家人民幣462.5元。兩年來國家給他的錢總數約11000元左右。他不但一點工作不做，反而在家里寫了二十萬言的陷害干部的誣告信。

1956年4月除了指控上述一些人為“反革命分子”外，又增控楊西光、蘇步青、徐燕謀、程雨民、數十人為反革命分子，又說民主黨派中漆琪生、等很多人都是反革命分子。

1956年8月，陳毅市長邀請復旦大學有關人士，在中蘇友好大廈舉行座談會，在会上孫大雨再次公然說，復旦大學

在解放后还有所謂“公館派”的活动。并当众拍桌子罵漆琪生、章靳以、全增嘏、苏步青、曹未風、陈其五、李正文、楊西光等为反革命。

1956年12月20日，本市政协召开第一屆第三次全体會議时，孙大雨当着一千余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員面前誣告曹未風、李正文、陈其五、楊西光、章靳以、漆琪生、楊豈深等人是潘汉年反革命集团中文教方面的重要分子，且声明有書面材料呈送中央請求調查处理。

1957年6月6日和6月7日孙大雨利用复旦党委整風机会，在外文系和全校教授座談会上更变本加厉，大肆污蔑章靳以、漆琪生、李正文、楊西光、全增嘏、楊豈深、李振麟、徐燕謀、謝受康、程雨民、龙文佩等人为反革命，并誣蔑解放日报和新聞日报內也有反革命集团。

1957年7月3日复旦工会召开教职員大会，对右派分子王造时、陈仁炳、孙大雨、楊兆龙展开說理斗争，孙大雨拒不到会，送来書面發言一份，其中又誣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部長史良同志为反革命。

1957年7月5日解放日报和新聞日报兩报社的职工多人，前往孙大雨家中严詞責問，根据什么誣指兩报社有反革命集团时，孙大雨又污蔑上海市付市長，新聞日报社長金仲华同志为反革命分子，并說：“解放日报社編輯部也有反革命分子”。

孙大雨这种無中生有，血口噴人，有計劃的先后对党和

国家机关中負有重要职务的人員和文教界人士污蔑誹謗，企圖陷害成罪，虽經陈毅付总理、市委第一書記柯庆施同志、書記魏文伯同志严正向他指出，他所控訴的反革命全非事实，劝其改正态度，承認錯誤。然至今他仍坚持其反动立場，頑固不化且变本加厉肆意污蔑，很显然孙大雨乃是別有用心，蓄意陷害好人。以誣陷好人为反革命来掩盖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陰謀。

謾罵并企圖篡夺上海文艺界的領導。1957年孙大雨写一篇文章交文匯报(未發表)对本市文化艺术界負責同志又肆行攻击，現將其摘要如下：

“人民艺术剧院付院長呂复、文化局長徐平羽、文艺工作部部长張春桥、第九办公室主任周而复，这四个人大概属于一个宗派。可以叫做“窒息派”，目的要把人悶坏，呂复最怕人提到宗派主义(他和李正文、楊西光、陈其五一样)。”

“上海京剧院(根据文匯报載)在董芷苓、王熙春、陈正薇等同志講話記錄中可以看到吳克坚、陶雄、呂君樵、楊玉坤作法是張(春桥)、徐(平羽)的嫡系真傳。”

“上海实验歌剧院(見5月14日文匯报)統治階層的社会發展还只到氏族制度阶段。張拓、張漁、陈強、管蔭深妻子陈明構成一个統治集团，压得同志們透不过气来，他分明还保持四大家屬遺風，用生殖关系作統治的樞紐，究竟是誰推荐，誰任命張拓的？張拓和徐、周、張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上影分成几个厂。我們担心若不把一些有問題的人揭



發出來，請他們走路，並且好好去改造，再多幾個分廠，也沒有用的。”

“上影經理袁文殊當眾檢討是空話”。

“在張春橋、周而復、徐平羽等領導下，好幾個劇種、劇院和廠都鬧得烏煙瘴氣，請黨和政府挽回威信，另派合適的人去領導，把張、徐等有窒息主義的人物撤換掉，改用勝任愉快的人去發揚‘百花齊放’”。

挑撥離間煽動反黨情緒。孫大雨在復旦大學外文系一貫挑撥離間，有意識地拉攏一部分人，打擊一部分人。肅反時他對一教授說：“你膽子太小了，你應該起來和他們作鬥爭，我支持你。”

當潘漢年問題被揭發後，孫大雨對另一教授說：“打擊我們的兩個人很快就要受到報應了。”

（1957年6月27日外文系教職員大會揭發）

孫大雨不僅製造不滿，而且還想煽動教師對抗領導。他曾經對一付教授說：“你應該大膽把問題說出來，我就是一門大炮，我們文學教研組有四門大炮。”

（1957年6月27日外文系教職員大會揭發）

### 附一：孫大雨給顧執中的信

編者按：這封信是右派分子顧執中交代出來的，

文中重點是編者加的。

執中吾兄：

感謝老兄的熱情支持，特報以革命戰友衷心的最高敬

亂。接信后因一直沒有人替我抄出一份發言稿的底子，緊張  
紛忙，身體不好，加上過舊曆新年，所以遲至今日始奉復，  
萬分抱歉。我在前年肅反運動中，回憶過去許多事情，結合  
當時的種種事態，發現了一個全國性而以上海為大本營的文  
教和統戰方面的反革命集團。最近在十二月廿日在上海市政  
協大會上，因迫不得已，當着一千多人（其中當然有這集團  
中的一些反革命分子）公開宣佈了我這發現，而且提名叫出  
了幾個其中的高教方面的骨幹分子。這個集團原來就是潘漢  
年集團，可是一年多來，他們依然逍遙法外，非但沒有歸案  
法辦，而且還在打擊好人，多方活動，建樹勢力，擴張地  
盤，現將發言稿寄上一閱。老兄離滬前對我說起過的那個托  
派分子，據我獨立的直接觀察和研究的結果，的確是個托派  
系統的特務，而且是此中人物。我這當眾揭發，對於他們每  
一個分子都是個晴天的霹靂。我現在確信，金仲華、沈志遠  
都是那個集團中的重要頭子。我這樣做他們要以攻為守，還  
擊我一下。可是我站定腳跟，挺直脊梁，決心和他們周旋到  
底。他們直接間接威脅哄騙我，包圍着柯、魏、劉等，對我  
施加壓力，要我撤回控訴、承認錯誤。可是我有把握，我揭  
穿了他們的秘密，擊中了要害，雖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一  
切哄騙脅迫當然堅決拒絕。現在戰鬥還沒有結束。領導方面  
則三大主義嚴重得可怕，麻痹大意不能使人置信。兄若在滬  
當可和我一同作戰，建立革命大功。但在京中則無能為力，  
奈何！此間有兩個戰友，一個天真幼稚，一個軟弱糊塗，凡

乎为敌人所用。幸亏我誓志坚持，而且另有几个战友鼓气，所以丝毫未曾动摇。关于蔣琪生、周煦良两个军统特务，你有什么材料吗？若有，望告诉我。

自前年十月中旬，反革命集团利用肃反运动，要把我打成‘反革命’，我抓住了他们的好几条尾巴，因而他们对我的进攻突然停止，可是我也就得了病，请假至今，尚未能工作。关于诗歌的理论和一些问题，我写得了一本十五万字的小书。完稿还在一九五〇年年底，今年大概可以出版，其中颇多论争，正符合「百家争鸣」的口号。

民盟的组织，在上海、在中央，问题都很大，我只想退出。我不参加一切会议已经很久，去年二月间到京，本想来看一下老兄，终于因来不及而未果。你学习何时结束？我的发言稿可给可靠的革命同志看，但不要轻易示人。两星期后请寄还给我，切勿遗失，至要。

祝健康快乐

大雨 二月二十三日

## 附二：給复旦大学全校教职 员工大会的一封信

编者按：7月3日复旦大学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会上对右派分子孙大雨进行揭发和批判，孙大雨托病没有出席，寄了一封信给大会。全文如下：

我有病请假，混身神经痛，不能来参加会议。

我对于上月7日我在全校座谈会上的发言，并无变动。上月

17日我写了一篇东西駁斥徐常太，“新聞”、“解放”兩張報紙和漆琪生、章靳以等，送各報發表，他們不敢發表出來，加以封鎖，却將大量對於我的歪曲、毀謗、造謠、污蔑發表出來。

我認為章伯鈞、史良、章乃器、儲安平是反革命分子，在上海方面，魯莽和徐仲年是反革命分子。

1957年7月3日

孫大雨

# 右派分子王恆守的言論

(摘錄)

## 一、對共產黨的看法

- 
1. 馬克思列寧主義  
“必要時還可以把  
他重新修訂一番”。
-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沒有看到今天科學的新成就，我們必須把新東西補充到辯證唯物論哲學里去，來豐富它的內容，必

要時還可以把他重新校訂一番。

(1957年4月25日文匯報王恆守“我看高等教育工作”)

- 
2. “天下一石，共產  
黨佔了九斗。”
- 

“三國時天下文章一石，子建八斗（指文才）。今天共產黨佔天下九斗（指名位），剩下一斗大

家分，所以矛盾多了。”

(1957年7月12日新民報“王恆守供認一貫反黨”)

- 
3. 有些黨員“在運動  
中專門打擊人家，  
抬高自己，打得中  
有功，打不中也有  
賞。”
- 

“去年黨內收了大批黨員（指復旦），有些品質很好，可是有些不大好，在運動中專門打擊人家，抬高自己，打得中，有功，打不中也有賞，比資產階級做獎

突还要穩。資產階級做生意還有虧本的時候，他永遠不會虧本。有人說，現在黨員行情看低了。”

（1957年6月8日王恆守在復旦黨委座談會上的發言）

“目前99%以上的黨員都有這三個主義，所以要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

（九三市分社機關小組會議上的發言記錄）

#### 4. “二流”與“三流”。

“羣眾路綫是老的，孫子兵法也有這樣說法，過去有人認為羣眾有兩種：一種是靠攏黨的，一是不靠攏黨的。靠攏黨的，黨就認為是羣眾，不靠攏黨的，就不被重視。”“靠近黨的是二流，想靠近黨尚未靠上的人是三流。”

“學校中現在有一批得寵的人，接近權貴，這些人都是‘二流子’。”

（以上系肅反學習小組中羣眾揭發，1957年7月9日王恆守在九三復旦支社大會上供認）

“現在知識分子中有些人向上爬、爭名奪利，有些人是捧住飯碗不說話，只有一部份人是敢說話的，他們真正對國家忠心耿耿，但這些人常受小人諷刺打擊，在歷史上如白樂天、杜甫等就是這種遭遇。”王恆守在這裡把自己比作上述第三類人而污蔑其他羣眾。

（1957年6月29日校刊第72期“數學系教師揭發王恆守的右派言論”）

“現在復旦年老的教授（民主人士）與年輕的講師、助

教对抗，学生与教授也对抗，这都是党委片面重視年輕人的結果。”

(1956年7月19日王恒守向市委统战部反映的意見)

5. “民主黨派也要有政治主張”，“统战部要為民主黨派拍桌子去爭。”

“民主黨派也要有政治主張。黨有幾十年的經驗和蘇聯的榜樣，政治主張大部份是黨提出來的，但有時我們也應積極提出

政治主張。因黨的主張經各級組織討論，我們過去只是同意，今後工作更細致了，黨有的地方照顧不到，我們應積極提出政治主張，不要被動下去。我們要主動，不要老是做尾巴。”

“各民主黨派有很多合理化建議都要通過统战部，统战部就要起挑選作用。如發現其中有好的須與有關部門交涉，他們不賣賬，统战部要為民主黨派拍桌子去爭。统战部不僅是站在黨的立場，而且應站在人民的立場。”

(1957年王恒守在市委统战部舉行的九三負責人座談會上的發言)

6. “教授治校”

“我有一個科學預見，將來大學里必然要做到‘教授治校’，因為全世界的先進大學的教育制度，沒有不是教授治校的。”

(1957年4月25日文匯報“我看高等教育工作”)

“因人的能力有高低，中央領導同志的能力高，應該領導，中級的領導也可以，到了具體工作單位，領導的能力不

行，不應該由黨領導一般民主黨派而應由上級總的領導。如‘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是否一定要黨委領導？學校不一定要黨委領導，而應由教授領導，上面黨作總的領導。”

（1956年11月29日在市高教局第二次視察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

“我主張總的還是由校務委員會負責，再分五個委員會，有管研究的、管人事的、管財務的、管學生思想工作的等等。……各個委員會都放在校務會議內，黨的領導是融化在各個委員會中。”“現在我們講的教授治校，就是說學校的無論什麼會，在學校中有最高權力的會，都應該讓教授參加，大家公開討論，包括黨委在內，決定了以後，還是要黨委起保證作用的。”

（1957年5月20日王恒守在九三分社“關於高等學校管理制度形式和教授治校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

“我提出教授治校，並不是主張撤去黨委。有人提出黨委可以不參加校委會，而我說不能沒有黨委，否則就不能工作。我的意見是黨委插在校委會中間，等到問題決定後，再由黨領導執行。”

（1957年6月在九三市分社座談會上的發言）

“加強黨對科學教育的領導，就是說要求黨多多地為科學教育創造更多更好的條件，使得提高下一代的科學水平。空談無用，必須採取實際行動來保證。……”

（1957年4月12日王恒守給工會黑板報稿“怎樣克服人民內



部矛盾”)

---

7. 党对知識分子的改造是“奶牛”政策、“牛肉”与“鞭子”政策。

---

“党对知識分子的改造是‘奶牛’政策，把知識分子当作‘牛’，有奶的时候就挤，沒奶的时候就一脚踢。”

(新聞日报1957年6月29日王恒守如此“仗义执言”)

“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是一手拿面包，一手拿鞭子，服貼的給吃面包，不服貼的抽鞭子。”

(新聞日报1957年6月29日王恒守如此“仗义执言”)

“共产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与对資本家的政策一样，是利用、限制、改造。”当时有人批駁他的說法，他即拍拍那人的肩膀說：“能利用你还算好啦！”

(王恒守在本校物理系学习小組討論宪法草案时的發言)

“自从去年肃反以来，复旦民主人士教授普遍認為复旦党委对民主人士‘不是团結是打击，不是教育是侮辱，不是改造是迫害。”

(1956年7月19日向市委统战部反映意見)

## 二、在歷次运动中的言論

---

1. “土改的确殘暴。”

---

“土改的确殘暴，現在浦东土改，女人被脫了衣服……。”

“乡下干部強佔別人妻女，因之农民暴动的地方很多，都給武力压下去了，上海一地看不出，好像天下太平。”

“土干部，什么也不懂，要講馬列主义我比他們懂得多；只因為他們有权力，所以才橫行霸道。”

（以上均引自新聞日報1957年6月29日王恆守如此“仗义执言”）

“以前是人耍猴子，現在是猴子耍人。”

（肅反小組会上羣众当面揭發王自己承認）

---

2. 抗美援朝是“听从克里姆林宮的命令”；“用血肉抵住鋼鐵”。

---

“中国人真傻，真可憐，听从克里姆林宮的命令，替人当砲灰。”

（新聞日報1957年6月29日

王恆守如此“仗义执言”）

“抗美援朝是用血肉抵抗鋼鐵。”

“战争要靠武器，共产党以馬列主义作武器，完全是唯心論。”

（新聞日報1957年6月29日王恆守如此“仗义执言”）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我們庆祝，王恆守却說我們“未免有点阿Q精神。”“因为美国懶得用力，美国頂好的武器还没有拿出来。”

（1957年7月1日新民報“王恆守發出無數毒箭”）

“这次战争一定是北韩軍（按：指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先冲过三八綫而引起的；美国人生活好，为什么会要战争。”

（1957年7月1日新民報“王恆守發出無數毒箭”）

“美国人看不起朝鲜战争，懒得用力，要真的打起来，简直是鸭蛋碰石头。”

(1957年6月29日新聞日报王恒守如此“仗义执言”)

---

3. 肃反运动是“用胡透派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办法”；“思想改造是镇压知识分子”。

---

“我们中国是一个無法無天的国家，现在总算有一个好好的宪法，但肃反和宪法有無抵触还值得研究。”

(1957年5月6日在市政协

预备会上的發言)

“肃反中是不应该犯偏差的，說錯誤不可避免就会原諒缺点，宪法从未規定肃反可以犯錯誤。”

“肃反中作为重点斗争的几个人，是很痛苦的。陈子展（编者按：陈子展并未参加肃反学习）和孙大雨都因此得病，几年来的积郁一直未能發洩，去年又被斗争，真是怨气冲天。”

(1956年12月20日在市一屆三次政协全体會議小組發言)

“肃反应该是公安部門和檢察官的責任，现在交給行政首長和党在抓，这样广泛地搞，在宪法上有什么根据？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有沒有委托給党做？”

(1957年5月6日在市政协预备会上的發言)

“我过去以为胡風是黨員，共产党分二派，二派爭权，胡風不得勢，后来探知胡風不是黨員，我想共产党好比是和尙，胡風好比是居士，都信佛，居士虽不出家，本領不一定

比和尚差。”

（肅反時在小組會上的發言）

“我現在才知道胡適派實用主義的危害性，你們（指共產黨）對我就是用胡適派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証的辦法。”

（肅反時在小組會上的發言）

“思想改造是鎮壓知識分子。”

（新聞日報1957年6月29日王恆守如此“仗義執言”）

“抓住小辮子，使得你服服貼貼，聽共產黨的話。”

（1957年7月1日新民報“王恆守發出無數毒箭”）

一定要解放台灣的聯合宣言發表後，在復旦大學召開的為解放台灣而鬥爭的會上，王恆守代表九三發言擁護一定要解放台灣，但後來王卻對別人說：“還不過是宣傳攻勢，宣傳宣傳而已，要打台灣不是那麼容易，人家第七艦隊有兵艦、大炮，還有雷達、音波記錄的偵察器。幾只木船渡長江差不多，離台灣那麼遠可不行。”

（摘自市政協“綜合材料”）

### 三、對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估價

1. “鞍鋼的無縫鋼管變成有縫鋼管了。”

“我報告一個驚人的消息：

鞍鋼的無縫鋼管變成有縫鋼管了，這是浙大的某教授在檢驗之

後親自告訴我的，這位教授是這方面的專家，他的話是完全可靠的。”

(1954年在市委统战部發言)

“党去年号召向科学进军，今年就煞車了，連一尺电絲都不易买到。我們不能以張之洞的方式办厂。”

(1957年2月11日在市统战部会议上發言)

“我們国家在軍事、政治方面肯定有成績，至少風气有所轉变。但在生产、經濟建設方面却不能这样說，比如一个工厂，仅把厂房建好，科学管理、科学技术、科学研究問題都未解决，怎能說成績是肯定的呢？”

(1957年2月向市委统战部反映的意見)

“我們自制的飞机是从苏联运来的，說自己能造飞机是騙人的。”

(在討論原子能宣傳的小組会上的發言)

---

## 2. “每个企業都亏本，苦头吃足。”

---

“搞科学是从無到有，現在看到处兴旺是不錯的，但經濟建設是否够科学呢？”“为啥去年有赤字呢？因不科学亏本了，好多企業都是这样的。”“党想做好事，刻苦耐劳是肯定的，但是每个企業都亏本，苦头吃足，沒有力量翻过身来，这是危机。”

(1957年1月20日在九三上海分社会上發言)

“还有大場养牛場的旁边有铁路，但是牛运来后不在这里下，要到江灣下，他們說是铁道部不允許，这里只允下猪，不允許下牛。这还不稀奇，养牛場在江灣，杀牛在徐家匯，每天要杀四百头牛怎么办，派許多人天天赶牛到徐家匯

去杀。如果火星上确实有人或者高等动物生存，它們拿望远镜向地面观测一下的话，啊呀！地球上这些人乱糟糟的哄来哄去，它們在干些什么呀！”

（1956年12月在市政协会上發言）

（編者註：宰牛場与养牛場不在一个地方是历史留下来的，宰牛場地方小，不能設养牛場。又因投資等条件还未能能在养牛場附近設宰牛場）。

### 3. 高等教育事業办 得“乱”“偏”“糟”。

“总起来說：这几年来高教系统的行政领导，三級制和二級制，校長还是集体领导制都还没有划一規定，校長以下的編制和职权也沒有制定出来，犯了一个‘乱’的毛病。业务领导方面，如生硬地学习苏联，修訂教学計划、教学大綱、工作量制度、口試制度等都弄得很‘糟’。在思想领导方面，导致老少之間矛盾，造成爱听好話的惡習，弄得很‘偏’。”

（1957年4月25日文匯报王恒守“我看高等教育工作”）

“一节課上45分鐘是什么制度？哈尔滨工業大学上50分鐘。其实上次流行性感冒是‘45分鐘’制度搞出来的。”

（1956年11月23日在市高教局上的發言）

“高教界的制度一直是混乱的，整个的中央高教部制度是混乱的，大学究竟是三級制还是二級制？还没有明确？”

（1956年11月23日在市高教局的發言）

“不能說什么都是成績主要的，缺点次要的。如教育系

統的成績是不能肯定的，打不到80分的。無論是專科大學、醫科大學，每個地方打不到50分。教育部長說成績是肯定的，我就不服貼。”

（1957年2月11日在市委統戰部的發言）

“中學、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質量低，不合規格，怎能說成績是肯定的呢？抗美援朝可打100分，教育部門只打三、四十分，平均分數還不錯，但不能說教育部門沒有缺點，只作對了一、兩件事，其餘都作壞了。”

（1957年2月向市委統戰部反映意見）

“解放以後的畢業生比解放前差多了。”

（1956年7月1日在市政協會上發言）

“國家辦農工速成中學是好意，然而方法不好，變成迫害。農工子弟文化水平不高，底子差，一進學校，就號召他們爭取五分。他們很積極，領導上一號召，就拼命讀書，因而有的生病，有的神經衰弱，有的自殺。”

（1957年6月17日解放日報載九三學社上海分社座談會上王恒守發言）

“……過去在我們的教育系統中，犯了很嚴重的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弄得處處碰壁，提了意見，不肯虛心接受，反而懷疑對方是否立場不穩，這種方法方式都不合乎馬列主義科學性的……。”

（1957年4月12日王恒守給工會黑板報稿“怎樣克服人民內部矛盾”）

“在教学方面，我还可以提两句：(1) 科学水平低的人指导科学水平高的人或做科学水平高的事；(2) 以阿Q精神来对待馬列主义精神。中国的阿Q精神是过去错了不肯承认，而是說现在情况变了，过去是应该这样的。由于阿Q精神存在，馬列主义精神就貫徹不进。高教方面也犯这个毛病：做错了不認錯，認為过去做的还是对的，现在因为情况不同了。”

(1956年11月29日在市高教局第二次視察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

4. “張之洞的失敗，  
生产关系落后原因  
小，沒有重視‘科学  
研究’的关系大。”

“过去有个偏向，往往直觉的看問題，很容易把‘生产’看做比‘研究’重要；在这个問題上我要大声疾呼地提醒大家：清代末

年張之洞开办工厂，提倡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来从事生产，結果都失敗。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慘痛教訓。我們必須研究他的失敗原因。道理很明显，就因为他沒有体会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以为有了武器，有了工程师，再配上一批工人就可以生产获利了。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有人認為張之洞的失敗，是在生产关系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但是張之洞的失敗，生产关系落后的原因小，沒有重視‘科学研究’的关系大，也就是說后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証明这一点很容易，我們只要看一看和張之洞同一时期的日本人办的工厂。兩边的生产关系都是同样落后的，但



日本的厂沒有那样惨敗，足見当时日本人的科学研究精神比我們強，就站起来了。”

（1957年4月25日文匯报王恒守“我看高等教育”）

“我听到別人告訴我，柯書記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議上不指名講：‘怎样拿現在与張之洞比’，这是我在统战部及政协小組会上的意見，我認为为什么不能拿現在与張之洞比呢？并不是比那时的生产关系，是比生产力，这是我国的历史教訓。”

（1957年3月11日向市委统战部反映意見）

#### 四、对苏联和學習苏联的看法

“王恒守看了苏联展覽会回来，除对極少数展品以外，大都不滿，實質上是他对苏联的仇視。”

（1957年6月28日新聞日报載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常务委員箕移今發言）

“梁思成被批判是冤枉的，最初提倡民族形式是苏联專家，后来反对的是苏联專家，結果梁思成倒霉了，弄得这老头子生病了。”

（肃反中在小組会上發言）

“华东师大关于物理学符号的事，學習苏联反而学坏了，如果不學習苏联倒不致于会錯。”

（在1954年一次教研組会上的發言）

“我从来未講过‘考虑’學習苏联，而是主張‘选择’的学

習苏联。”

（1957年7月1日新民報“王恆守發出無數毒箭”）

“苏联教材，顛來倒去，插圖又不清，又簡單，世界上印得最坏的就是它。”

（王恆守在理論物理教研組上的一次發言，1957年7月9日在九三支社大會上供認。）

“佛子嶺水庫原來是中國專家設計的，後來蘇聯專家來了全部推翻重新搞過，結果大水一來就沖垮。工程負責人後來對中國專家說，你們的設計原來是對的，因為是蘇聯專家所以不得不批評你們。”（摘自市政协綜合材料）

“王恆守一貫崇拜美國，蔑視蘇聯，如蘇聯幫助我們建設的長江大橋合龍，王恆守說：這有什麼了不起，又不是新式的，不如華盛頓大橋，華盛頓大橋能通火車。但據我知道，華盛頓大橋不是世界最大的，又不能通火車。”

（1957年6月28日復旦九三支社全體大會上丘日慶教授揭發，7月9日王在九三支社上供認。）

“美國、蘇聯只有一海之隔，美國在研究火箭砲，希望能一砲打到莫斯科，而蘇聯也希望一砲打到紐約，他們互相勾心斗角。”

（1950年上課時的說話）

“世界鬧得不和平，全因蘇聯想要全世界走共產主義的道路。美國人生活那樣好，決不要戰爭。”

（1957年7月1日新民報“王恆守發出無數毒箭”）

# 右派分子張孟聞的言論

(摘錄)

## 一、對黨和黨的領導看法

---

1. “最奇怪的是黨委領導學校，……像匈牙利就是這樣搞起來的。”

---

“工人階級怎能領導文教部門，”“共產黨不能領導大學。”

(摘自思想改造時張孟聞的“自我檢查”)

“對李局長(高教局付局長)報告中最奇怪的是黨委領導學校問題。我知道黨委不能領導，而是校長領導，黨員是可以由黨委領導的，行政和黨一定要分開，這方面搞不清，一定會引起混亂，像匈牙利就是這樣搞起來的。”

(1956年11月在視察高教局時的發言)

---

2. “黨員以改造思想者自居”；“靠攏黨的人不一定是好人”；“積極分子是投機分子”；知識分子都學了“金人”。

---

“過去直到目前的情況是少

數黨員以改造思想者自居，我們就是被改造的對象。七年來，在黨和政府的領導教育下，我們政治上、思想上的進步，在這些人眼中毫無成績，一般仍是被看成要改造的對象。特別對個別黨員

或政府設施提供不同意見的人，那就必須打下去所謂并不存在的‘威風’。去年高教部一位負責同志甚至在我們學校內公

开宣称：凡对政府措施提供不同意見的人，甚至是响应号召提供意見的人是‘死硬派’，毫不足取，存心对立；只一味順从的人，才是靠攏党、靠攏政府的人。”

（1956年8月13日解放日报“說一說自己的意見”）

“靠攏党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假裝積極，比原来積極的人更積極，使原来靠近党的就离开党了。”

（在1955年反胡風反革命集团时學習小組会上的發言）

“去年入党的人我提过意見。这些積極分子，是投机分子，學問上不好，历史上也未搞过革命，他們什么东西也不行，我根本看不起他們。”

（1957年5月16日在上海市宣傳會議复旦大学代表小組会上的發言）

“近年来統一戰綫工作也有偏差，党对某些形式上靠攏党，本質上可能有問題的‘積極分子’很重視，总認為他們进步很快有很大轉变，因而捧得很高。但是，对过去的‘同路人’却疏远了，他們中間有的會有若干問題，却很有骨气，可是党對他們不仅疏远了，甚至还要罵他們背进步包袱，是‘死硬派，因此这些人开始消極起来，有的說：‘我們过去是有所为，現在則有所不为了’。”

（在列席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后的言論）

“如果有人要求結合实际，就随便扣上反抗領導，反对政府以及各种各式的大小不同的帽子；据理力爭，就被認為死硬派、頑固派……在大会上当众指責；年輕人也跟着起

哄，把老年教授撕扯得体無完膚，好像要做到这样地步才是前进有为。即使政府和党已經号召向科学进军，老少团结、尊师重道了，也还有人鼓动青年，向老师‘进军’，大肆攻击，羣起鬪，务使閉口無言，‘明哲保身’，安安靜靜，做听话的‘好人’而后快。……”

“别人的科学預見，被人說成落后；而主持人錯了，要變了，却用辯証法来掩护。認為是条件變了，所以必須跟着改变，往日既無偏差，今天更無錯誤。硬不認錯，甚至以不能避免錯誤自解，誰做事都不免有錯，但应当从錯誤中吸取教訓而不應借此作擋箭牌。最近座談会上，有人引飞机来作比喻。乘坐飞机以前，駕駛員如果先同乘客說明不能絕無錯誤或‘錯誤不可避免’，恐怕很少有人搭乘飞机了。凡是主持大計的黨員們，倘使以不能避免錯誤来作掩护，而在事後既不檢討，又不認錯，甚至在肃反运动中个别的偏差，也由集体負責，个人脫然無累、干淨利落，一無責任。偶然有人批評他个人的錯誤，竟以‘朕即国家’的态度，認為这就是批評党、反抗領導、批評政府。把个人和党与政府整个联成一气，等同起来，形式邏輯地演繹成別人的無妄之災。这連形式邏輯的周延問題也沒有搞清楚，怎么能叫人心頭服貼。……”

“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深受了数千年来的影响，‘明哲保身’，大家都学了金人，三緘其口。尤其在几次运动中对敢于直言者的‘鬪’，不能不談‘虎’（所謂思想老虎一原註）色变，观望‘行情’，識相为佳，至少可以不吃眼前亏。”

“但是在偏風橫吹‘圍剿’威脅之下，甚至難免被‘剿’成‘落后’以至‘反動’，我們想想螻蟻猶且偷生，何以人而不如動物乎？對這樣遭遇的黨外同人不能不有同情。”

（以上均引自1957年4月26日文匯報“我看黨羣關係”）

“孫大雨和我，解放前都參加革命工作。在最危險的時候，只有我敢出來講話。可是一解放，就“打”我們。這是什麼道理？從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一天起，這個問題一直存在。為什麼市委就抽不出時間來找我們談這個問題？而總是採取推諉辦法。要許廣平和中央宣傳部的同志和我們談。我們還能夠自我批評、檢討，為什麼共產黨就連這樣的勇氣也沒有。”

（1956年12月20日在市政協一屆三次全體會議中的發言）

## 二、對歷次運動的看法

---

1. 抗美援朝運動“是志願軍先侵犯人家。”

---

“中國人民志願軍是政府派去的，而不是自願的。”

“是志願軍先侵犯人家，美國飛機才來轟炸我國。”

（抗美援朝時對學生的說話）

---

2. “三反”、“思改”等運動中，“沒有問題的被鬥，有問題的被放過了……中共絕不能走匈牙利之路”。

---

“三反、思想改造、肅反，每次都有鬥爭重點，沒有問題的人被鬥，有問題的人被放過了。……有的人受不起怨屈而自殺了，有的發神經病，但領導都以

‘难免有錯’來對待這問題，中共絕不能走匈牙利之路，看到匈牙利問題應引以警惕。”

(1956年11月在視察高教局時的發言)

“(院系)調整以前，先有三反運動和思想改造。這二個運動對高級知識分子的改造起了很大的推進作用。但也由於主持運動的個別黨員掌握政策有偏，甚至工作作風十分粗暴，特別以‘改造思想者’自居，高高在上的來改造別人；而自己的思想、作風，以至業務與哲學的修養都未必足以服人。這就招來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於是黨羣之間開始有了隔閡。”

(1957年4月26日文匯報“我看黨羣關係”)

“記得1954年華東統戰部邀

---

3. 肅反是“人身報復”，“違反憲法”，“使人毛骨悚然”；“共產黨會治人不會治法”；要求成立“平反冤獄委員會”，“算清舊帳”，“算總帳”。

---

集高教界座談，我在那會上指責了一些人，但在這次肅反運動中就被當作重點來對待。另外一位市人民代表，陳市長當面對他保證過，要他講話，保證無人會作報復，但在陳市長遠居北京時期，這位代表在去年也作了肅反

的重點對象。而且還合起來當作為反黨、反政府的小集團。”

(1956年8月13日解放日報“說一說自己的意見”)

“上次向華東統戰部提意見尖銳就受到報復，像我在人代會上一樣，我是經得起的，但有些人經不起就發瘋跳樓自

杀了。”

“整个高教界有問題，牽涉到宪法，犯法的人应受处分，錯誤的人应檢討。”“肃反运动是毛骨悚然，过去被反动派杀死是烈士，而现在是冤枉，希负责同志好好考虑，不要使人憤慨，要算总賬。”

（以上均系在1956年11月視察高教局时的發言）

“大家要求处理問題，旧帳要算清楚，……肃反是有違反宪法的事，有的党员做事不講法制，有些事情告上去或是石沉大海；或是把告的人的意見拿到对方手里，搞来搞去还是搞在原告身上，官官相护，受冤屈的人永不翻身，所以要成立‘平反冤獄委员会’。”

“共产党会治人不会治法”，“党员犯法，不能法办，成了特殊分子”。“现在法律还没有，要赶快訂出来，使党员不能乱搞。”

（1957年6月6日在复旦大学民主党派負責人座談会上的發言摘要）

### 三、对教学改革、学习苏联、与 向科学進軍的看法

---

1. 院系調整，造成“高教界不可弥补的損失。”

---

“只由主持人的主观願望来支配（院系）調整，造成了优良傳統的消灭，圖書、仪器、人事的不必要分散与过度的集中，到



今天还是高教界不可弥补的损失。当时就曾被人称为‘乱点鸳鸯谱’。”

(1957年4月26日文匯報“我看黨羣关系”)

2. 教学工作量制度  
是“剝削”，“高教  
部官僚主义”。

“这也不算，那也不算，  
(編者註：指教学工作量制度)  
高教部剝削我們。”

(1955年在教研組討論工作量會議上的發言)

“学校里一定要这样做，(指实行檢查性听課)到底还要不要我們知識分子。”

(1954年在一次校委扩大會議上的發言)

“上面一句話，(指推行大實驗)下面做死人，高教部官僚主义。”

(在一次教研組會上發言)

3. 學習苏联是“作苏  
联的奴才”。

“过去學習英美，是做英美的奴才，今天學習苏联，是做苏联的奴才，但苏联人并不要我們

作奴才。”

(1952年推行學習苏联时在教研組會議上的發言)

“接着教学改革，高教部为此連年召开會議，从学制、教学方案，一直到教学大綱，大小巨細都成一套。……方案年年变，教学内容也年年不同，連課程也每年跟着变动，教書的每年要預备不同教材的新課。教課方面已經感到应付为难，却又要教条式地學習苏联。而在某些环节上既無具体指

示，反而要人各自摸索；如果有人要求結合中国实际，就随便扣上反抗领导、反对政府以及各种各式的大小帽子。……”

(1957年4月26日文匯報“我看黨羣关系”)

---

4. 向科学进军是“空喊口号，空見之于条文”。

---

“柯庆施同志关于上海工業方針的报告說，上海是人才大量集中的地方。不錯，上海人才原来是大量集中，可是現在大量外調支

援外地之后，已經不是‘大量’而是变成‘少量’了。”

“上海作为一个科学技术人才大量集中的城市來說，現在已經比不上剛解放时候那么集中了”。“可是上海对于科技人才甚至科学机构的大量搬开，从来没有惋惜过。”

“作为科技人員的集合活动机构的上海科联和上海科普，从来没有引起党政人員的关心。一直到現在，兩机构的领导机构沒有确定。連一所可以回旋的开会場所都沒有搬給一幢夠大的房屋。”

“交大在过去有其光荣的历史。在当前上海有其應該負荷的任务，为什么不能考虑留下来。”“从个人主观看来，市委方面不說一句話，給人一个印象，即是科技人才以至机构搬离上海，上海并不在乎。”

(以上均摘自1956年8月在市一屆四次人代会的大会發言)

“12年科学研究规划是科学院随便找几个人主观地訂出来的。訂出后又沒有組織力量实行。如調查动物分布狀況的工作，一年已經过去，还没有动静。象这样下去，就是120

年也搞不好。”

（1957年5月6日在市政协一屆四次全体會議中的發言）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切實研究地方科學規劃’，這樣的提了一句。使人莫明其妙，也沒有與誰商量過，叫人怎樣做起，這是空話。又談到‘對一部份高級知識分子已根據工作需要配備了各類助手’，這樣講有些誇大，講得漂亮，事實上據我所知只有華東師大孟憲承有助手，我在復旦就沒有聽到誰有助手，我曾向高教局申請助手，但兩年來沒有要到。……號召向科學進軍，空喊口號，空見之于條文。”

（摘自1957年1月5日在市二屆一次人代會中的發言）

#### 四、對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的看法

##### 1. 反革命分子“有才 有德，對革命有功”。

“周（編者註：周惠生系本校肅反中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有才有德，對革命有功，是起義

人士，不該看作一般人員。”

（1955年肅反前評級定薪時的意見）

“賈植芳（編者註：原系本校中文系教授，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已被逮捕）問題不是政治問題，而是思想問題。”“雖然，我對賈植芳不認識，但可肯定他不是政治問題，儘管你們這樣說，我是這樣看的。”

（1955年肅反開始時的意見）

---

2. 右派分子是守正不阿，敢于直言的“勇士”。

---

“而对于守正不阿，敢于直言的少数‘勇士’們（編者註：指右派分子王恆守、孫大雨之流），即使是‘个人英雄主义分子’（几次运动对这些人的称号—原註）吧，也滿覺得‘不無可取’，雖然他們也許是不高明的‘戰友’。”

（1957年4月26日文匯報“我看黨羣關係”）

“我是孫大雨先生的朋友，我愛朋友、愛真理。……不能把孫大雨美化成一個英雄，但也不能丑化成一個混蛋。……我認爲孫大雨是愛國的。……他這個人多少受了委屈，高級知識分子‘士可殺，不可辱’。……我不怕說我是孫大雨的朋友，因為我不相信他是怎麼了不得的壞蛋。”

（1956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政協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  
上的發言）

---

3. 自詡“有膽量”，  
所以“出了名”。

---

“有些黨員自高自大，我們可以起來提意見，保證不會有殺身之禍。有自信心就應該立起身來講話。……民主氣氛要靠我們爭，必須鳴。……”

（摘自1957年5月4日在市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中的發言）

“去年解放日報將我搞出了名，（按：市一屆四次人代會，張孟聞大會發言時以‘有人修改他的發言稿’為推辭，在大會上要無賴。後在解放日報上受到羣眾嚴肅批評）人民有事就要我來搞。因為我大胆，所以我的人民代表就有權。要

我做，我一定負責的做，但要有權。”

（摘自1957年5月23日市政协一屆四次全體會議中的發言）

“這些意見（按：指張在列席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後的言論），我曾在全國政協小組會上露了一些‘苗頭’，這些話講後，好幾位主動到我房間裏來，都一致說我講話有膽量。”

（市政协綜合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後的材料）

# 右派分子李梧齡的 八點綱領及部分言論

## 一、八點綱領性的意見

### 1. “馬列主義的偏見。”

“我要求大家抱着純客觀的態度來討論問題，有人說這不可能，說不是這個立場，就是那個立場，我是不同意的，因為所謂只有兩種立場的看法，是從馬列主義而來的，而客觀真理並不見得就是馬克思主義，我的本意是對黨沒有敵意的，如果你們認為有敵意，那是馬列主義的偏見。”

### 2. “愛國人士為無產階級着想，不等於承認無產階級領導。”

“從古到今都有愛國人士，如杜子美、陸放翁等，只要是愛國的人士，都是為低層人民訴苦的，當然所謂‘低層人民’就是勞動人民。他們要為低層人民訴苦不外是這三個理由：(1)他們是大多數，(2)他們受到的文化教育少，愚昧無知，(3)沒有人做他們的代言人。愛國人士為無產階級着想，不等於承認無產階級領導，譬如我們孝順父母，但他們的物理數學沒有我們好，我們可以不要父母領導。”

---

3. “一定要說成是引導大家走向共產主義的路，我不贊成。”

---

“我沒有認為資本主義優越；對社會發展問題，我沒有研究；將來什麼面貌，我不是學政治的，也不感到興趣。‘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是一種理想，可以不相信，唯物主義不反對說有的東西我們還‘未知’吧？我說過人類道德不可能達到（有沒有說過智慧，不記得了）——（註：復旦校刊第74期報導六月廿八日下午物理系助教組座談會上李梧齡說：共產主義太美好了，憑人類的道德和智慧是達不到的。）這是不是校刊標題上說的‘反對社會主義路線’呢？不是，我對黨的政策和方針是並不反對的，對祖國的建設是歡欣鼓舞的；但一定要說成引導大家走向共產主義的路，我不贊成。”

---

4. “現在只有共產黨領導，不得不贊成共產黨。”

---

“我覺得黨有缺點，我接觸到的黨員就都有缺點，說明黨的實質。我現在贊成共產黨是因為其

其他的黨沒有執政能力；現在因為只有共產黨領導，不得不如此，沒有任何理由說一定要共產黨領導。我說多黨制有好处，是指幾個政黨互相監督。我對資產階級民主是很欣賞的，我雖然認為其他的政黨沒有執政能力，但我自己絕對沒有提出組織政黨。”

---

5. “是否將來有別的政黨更強大現在还不知道……古代人和現在美國英國都有愛國者，難道他們思想上也要受共產黨領導嗎？”

---

“憲法是百年大計，希望一直用下去；但是否將來有別的政黨更強大，現在還不知道。共產黨的毛病就在於太相信自己，相信只有共產黨人能愛國。我對共

產黨是心服的，願意跟他跑，但為什麼思想上也要受共產黨領導呢？我思想上有自尊心的。古代人和現在美國、英國都有愛國者，難道他們思想上也要受共產黨領導嗎？”

---

6. “葛佩琦、儲安平的話，本人樂於引用，這也許是我的本性用是我的本性。”

---

“儲安平、葛佩琦的話，本人樂於引用，這也許是我的本性吧！——喜歡言過其實，語言生

動，譬如‘殺共產黨人’我認為是忠告，我不為他們辯護，因為指明他們是右派分子的，一定還有其他材料，我不知道其他材料是什麼？所以不能肯定他們是右派分子。但就他們發言本身看來，沒有什麼錯。共產黨不是傻瓜，他們也不是傻瓜。如果認為死人穿過的衣服不能穿，是一種迷信；那麼，我們也就不能認為他們講過的話，我們就不能講。在我所知章伯鈞是右派分子，因為報紙上揭露了他的其他材料，羅隆基根據最近報紙的報導，我現在認為他也是右派分子，但根據發言是不能斷定的。”

---

7. 肅反是“殺雞給獅看。”

---

“我覺得對青面獠牙，殺人放火的人進行肅反，是完全必要的，

但問題在於是不是真正肅反。有一部分不是在肅反革命，譬



如我在肃反时被斗争，我就不是反革命，这样事实全国都有，不是个别错误。我怎么是反革命呢？这是有点杀鸡给猴看的。又譬如我一到系内工作，就发现即使在系内教书的，就不如我在学生时代想的天真，常常在背后骂，这是由于政治问题？由于党脱离群众？有人拍马屁，党爱马屁的关系。”

8. “只重口袋不重人。”“烧掉人事袋。” “物四会上有人讲到我系有教师领学生到北京去生产实习，

因为人事材料未到，就不允许进实验室，这是对知识分子信任吗？我还从很多小说上看到党‘只重口袋不重人’，因此我建议烧掉人事袋。”

（以上系1957年7月1日在物理系教职员大会上的发言）

## 二、对共产党领导看法

“宪法上规定共产党的领导我就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党员共和国。”

“共产党所以能领导，只因为共产党力量大，其他政党力量太小，不得不如此，并不是由于国家性质等关系。”

“应该成立两个政党，使另一个政党发展得和共产党有同样的势力，以便监督共产党。一旦共产党腐化变质，马上可以取而代之。”

“三大主义不是个别党员的问题，党的作风就是三大主义”。

### 三、对党团员工農干部和積極分子的看法

“能夠代表羣眾利益，真正符合黨綱的黨員是理想氣體。”  
(意即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

“黨團組織生活是做禮拜、禱告；上級指示是聖經；團員是黨的奴才，是燒香老太婆，沒有主張，是人家的函數。”

“積極分子是流氓，一見生財”。“好像小孩玩的开了發條就跳起來的青蛙。”

當工农羣眾起來反駁右派分子王恆守的謬論時說：“他們什麼也不懂，在瞎搞；他們根本看不懂王恆守的文章，只曉得跟着共產黨講，非但應該受到一百倍的指責，而且應該吃屁股。”

### 四、對新社會及社會主義道路的看法

“人事室是最黑暗、最見不得陽光的地方，人事袋應該燒燬。”

“我對資產階級民主是很欣賞的。”

“在這種社會里毫無自由可言，一切都是沒有辦法和迫害，民主自由都是假的。”

“我想到台灣去，那邊是自由的”。

“一有機會馬上出國到英美去，在這裡毫無意思。”

“若鞍鋼被美國扔了炸彈，我站在人道主義立場上毫不惋惜，若中國士兵被殺，我站在人道主義立場上也毫不

情。……”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要脸的掠夺。”

## 五、对肃反的看法

“高等学校的肃反是不择手段，不惜工本。”

“大家是鷄也是猴子。被拿出来杀的就是鷄，没有被杀的就是活猴。鷄和活猴包括在座諸位，共产党是杀鷄者。”

（編者註：李梧齡認為肃反是杀鷄給猴子看，当有人問誰是鷄，誰是猴子？他就这样說。）

（自第二部分到第五部分均引自1957年8月9日解放日报“李梧齡百般咒罵共产党和新社会”）

# 右派理論家王中的新聞學理論

(摘錄)

## 一、“報紙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

“報紙是一定社會產物，它決定於社會的需要，而不決定於辦報人。誰違反了這個基本規律，就不能把報紙办好。”“解放前新聞報和偽中央日報等都是反動的，為什麼前者有人要看呢？因為它有一部份內容滿足了人們的正當需要。而偽中央日報把自己的政治主張放在面孔上，所以許多人不要看。”

(1957年1月22日在解放日報業務學習座談會上的談話)

“把報紙看成是階級鬥爭的產物，那就意味著報紙的使命就是階級鬥爭，報紙的任務就是階級鬥爭，報紙生存的價值就是階級鬥爭，報紙是將要隨着階級消滅而消滅。這顯然是一個荒唐的看法。比如拿現在我們的國家情況來看，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到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就講過：階級鬥爭基本上結束了。那麼我們的報紙是不是基本上結束了呢？沒有，報紙不是照常出嗎？……如果把報紙僅僅理解成爲階級鬥爭的產物，那就意味著報紙的使命就是階級鬥爭，那末在目前的形勢下怎麼解釋呢？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報紙是不是還在那里天天搞階級鬥爭呢？那就是荒唐，這與我們整個國家的形勢抵觸了。”

“你不能老是啃住(报纸)就是阶级斗争工具,显然是解释不通的。你说报纸就是政党的宣传工具也解释不通。不是政党就不能办报吗?也能办报。”

“我们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工具。过去完全正确。今天恐怕要根据阶级斗争形势来另外一个提法。”

(以上均见1967年3月11日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讲话录音稿)

## 二、“报纸是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

“我认为报纸有二重性：一重是宣传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是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商品就是要使人买后有用，改进报纸工作，主要是解决如何把报纸变成为群众所需要的东西。报纸先要为群众所喜爱，然后才能发挥指导作用。”

(1967年1月22日在解放日报业务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

“报纸通过新闻，以什么方式来服务呢？就是通过商品的形式。也就是说，我制造一种商品让你自愿地买，你买了以后，你就受我影响，那我就来服务。有人反对说‘报纸不是商品’，这个我看不对。报纸是商品是个事实，你反对也好，你不反对也好，它就是商品嘛！它就是嘛！为什么它是呢？你要钱嘛。”

“两个方面是相互结合起来发生作用，要是结合不起来，就不能够发生作用，也就是说‘办报卖’和‘买报看’两个方面

必須結合，一个方面講‘办报卖’，‘办报卖’的人極力地想用我的意志来影响你，‘买报看’的人是極力地想要买到我所需要的知識。”

“在我看来，还是服务性多一点好，指导性对我用处不大。”

（以上均見1957年3月11日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講話录音）

“报纸要根据讀者需要来办，这是办好报纸的根本問題。离开了讀者需要，只把报纸当作党的宣傳武器，不把它当成讀者化五分錢購買的一种商品，报纸必然不会受讀者欢迎的。”

（1956年8月4日在新华日报的講話）

“兴趣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們所受到的影响，因此有其必然的东西，我們就是要找到这个东西来改进报纸。”

（1957年春季在解放日报的講話）

### 三、“党委領導上不懂得办报的性能。 办报人心里一有党委就办不好”

“某地报社向党委提出少登一点指示，增加一些羣众活动。党委負責人就到处批評报社是不要党性只要羣众性。由此可見‘党性’者即‘党委性’、‘書記性’也。”

“党委很容易忽視报纸的特点，或者仍然習慣于抗战时期和階級斗争时期的作法，对在新形势下报纸应起的作用認識不足。报社如接着党委的旧習慣去办报，便会造成报纸脱离

羣众。”

“报纸，在党委看来是指导别人的工具，但是在读者看来，报纸是借以获得新闻和知识的出版物。读者化钱买报，我们要对得起人家的五分钱；如果赠阅的话，人家可能没什么理由责备报纸。”

（1957年5月16日在首都召开的新聞工作座談会上的發言）

“党报的宣傳，要像騙小孩子吃藥一样，加一些糖，小孩子才吃，否則苦得不能吃。”

（1957年2月21—23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報紙工作座談会上的發言記錄）

“解放日报鉄青的面孔，一片机器呼隆声我們都是人，而人都是热爱生活的。”

“我們对社会生活的态度，是只有生产，沒有生活，工人看了也头痛。”

（以上在大众日报編輯部全体干部會議上報告——1955年8月10日）

“省报披着一副‘寡婦臉’不討好人家，羣众都不要看。你越想指导性強就越沒有指导性。你要軟的东西給羣众，使他們接受，然后才能起教育作用。”

“党报的社論是羣众可听可不听的东西，党委領導上不懂得报纸的性態。省报改革有三派：社長、总編輯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普通記者是積極要求改革的‘少壯派’；組長一級是‘兩面派’。”

（1957年春季在复且大学的講話）

“閱讀報紙是出于人們自願，報紙對讀者不能起強制作用。因此我們不能靠黨報吃飯，向讀者發命令。”

（1957年春季在解放日報講話）

“現在的黨報‘成了黨和政府部門的公告牌’，‘黨報上的一些社論是臭狗屎’。”“辦報人心里一有了黨委，就辦不好。”“你們報紙辦不好，就是吃了黨報的虧，就是同黨委的關係上有問題，省委叫你們這樣辦，你們又不能不這樣辦。”“報紙辦不好不能光怪報館，首先黨委要通，不向黨開刀，不解決問題，不能叫報館夾在當中。”

（以上均摘自山東大眾日報來信）

#### 四、對蘇聯的新聞學與資產階級新聞學的看法

“蘇共報刊史着重講到政治的關係，政治性強，缺乏業務性，難提供理論。無產階級新聞學以唯物主義說明新聞事業，但缺陷是體系完整上不如資產階級新聞學，狹隘零碎不完整。”

“中國解放後的新聞學，把舊的一套都排斥掉，但沒有什麼材料可講。黨提出‘百家爭鳴’後，最近一、二年來，認識到可以批判吸收資產階級新聞學。”

“過去我們說他們（指資產階級新聞學）完全胡說八道，這也不一定的。資產階級新聞學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是新聞’蠻有道理，這意思是說，一般常態，人們都知道，



不喜欢看，而新鮮的不知道的东西，人就喜欢看了。”“新华日报登了一条消息：合作化后96%的合作社增加收入，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4%减少收入，人家就要看看，为什么合作化以后农民还有减少收入的？”

（1957年1月24日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講話记录稿）

“我这个人有怪脾气，‘人不吃饭，就会饿死’这样的真理我不大愿講。因为誰都曉得，这是天經地义的。我就喜欢講一些歪道理，自己想的一些道理，意見不成熟的，还有講头。”

（1957年3月11日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講話记录稿）

## 五、报纸的作用、性質及职能的看法

“列宁說过，‘报纸是集体的組織者’，总的說来是这样。但是，在任何条件和任何情况下报纸是否能够發揮作用呢？”

（1957年春季在解放日报的講話）

“报纸的集体宣傳者集体組織者这一个作用是不是还是像革命爆發前后的那样来理解，我觉得是一个問題。是不是？当然，我并不提倡修正主义。……我和我們的同志，教师先生开个玩笑。我們的教师先生也是教条主义很厉害。我說是不是每一条新聞都是有組織作用，他說‘当然是啦，集体的組織者’。我就提一条給他解釋解釋。那时候正是貝魯特生病的消息，我說‘这一条怎么把你組織去了？把你組織得哭了还是笑了？什么也沒有，什么組織作用也沒有。’他說‘这一个，这一个’，解釋不出来了，我也解釋不出来。我說‘仔細研究研究吧’。不想一想，不思考思考，搬着一句話到处乱套。……

拐八个弯子去解釋，都可以解釋通的。大便也是階級鬥爭。為什麼呢？你不大便干結不舒服嘛。一大便出來多吃飯，健康了，可以去殺敵嘛。是不是？”

“列寧在1918年指出來什麼問題呢？他講我們這個報紙今天政治談得太多，今天政治已經明朗化了。歸根結蒂就是兩個陣營。這些政治兩三句話就講完了，我們要多談談經濟。所謂經濟並不是知識分子的空論，而是人民生產中的實際生活。……在社會的性質變化了，整個人與人之間關係變化了，那麼報紙的性質，辦報的方針也應當隨着變化。……”

“報紙的性質，它是通過報紙的各種職能表現出來。……”

“報紙的具體職能有以下幾個方面：（一）供應新聞，闡明新聞。因為人們有了解周圍的情況的需要，報紙的職能之一，或主要的職能，就是供給人們以新聞。……（二）組織輿論扶植民主。……為什麼資產階級發展了報紙，這是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分不開的。……我們的報紙有沒有這種職能呢？也有。也是我們社會主義來扶植民主組織輿論的工具。……這也類似資產階級的政府對待廣大資產分子差不多作用。……（三）指導工作指導生活。……在我看來，還是服務性多一點好，指導性對我用處不大。……（四）培植道德。……（五）增進知識，提高文化。……”

（1957年3月11日在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的講話記錄稿）

# 毒草篇

(綜合本校“鳴”“放”中的部分言論)

## 一、對共產黨的看法

### 1. 反對黨的指導思想——馬列主義：

(1) 馬列主義的系統性一貫性像宗教信條，可說是廿世紀的新宗教。

(2) 無產階級立場是人造出來的，客觀不存在，無產階級立場也可以拿良心來代表，任何好事只要良心沖動就能做，不要無產階級立場。

### 2. 反對黨的領導：

(1) 取消黨委制，我會舉雙手贊成。黨支部沒有也可以。

(2) 解放後，有黨天下的味道，黨雖為人民服務，但不相信人民。黨員在羣眾中所起的作用是監察作用，好像人民老是要做壞事一樣。這在解放初期可能是必要的，但長此下去，就造成黨和人民之間的深溝了。現在黨與人民的关系，就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味道，而不是大家真正的來做國家的主人。就像報上所講的，黨員建“溝”、團員建“牆”、積極份子建“鐵絲網”。在系里，我們怎麼講話也沒有用，不及一個年輕的黨團員。因此“積極份子”就變成了迎合黨的一批人。他們不是真正地去辦好事情，而是壓在人民頭上維持自己地位，黨却重用他們，使人民更不能接近黨，幾年來“牆”是這

样建起来的。我希望共产党改变作风，如果党不好，人民是要反对的。党天下像满清入关后的作法，是行不通的。

(3)“党天下”是事实。党领导一切，决定一切，以党代政。中央的部长和学校的科长等，虽有非党人士，但他们不能决定问题，一切问题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党委会决定的；部队根本不许民主党派活动；民主党派只是附属品，他们不能做主。

(4)外行领导内行，确实造成了工作中不少损失，如强调增产节约，影响科学研究，原因就在于不懂业务。

(5)这次整风如达不到效果，就不堪设想了，人民会推翻党。

(6)我热爱社会主义，但反对共产党。

### 3. 污蔑党、歪曲党的性质：

(1)复旦做事偷偷摸摸、鬼鬼祟祟、见不得阳光。

(2)党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往往不择手段，利用红萝卜，(假积极分子)党棍子、品质不好的人去斗别人，结果是非不分，把别人的积极性也打下去了。

(3)除了“三大主义”以外，还须加一个私利主义。私利主义中首先是拍马屁，领导也有喜欢拍马的，这叫做“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我们对牛，能做工作时给它吃草，做得好吃好草，到不能做时就吃它肉。今天我们在用人方面如果也像这样，就是私利主义。

(4)复旦大学的党是宗派主义的党，××系里根本没有民主。

(5) 黨員的作威作福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是黨的組織的產物。

(6) 共產黨為了工作必然要搞宗派，為了作官必然要拉攏人，來了運動就隨便打擊，過去有打拉政策。

(7) 黨總支辦公室很神祕，陰森森的像警察廳，叫人望門興嘆。

(8) 帝國主義往往和地方上反動勢力結合在一起，彼此合作，來奴役人民。而革命的黨絕不能和內部反動力量妥協，應該對惡勢力首先開刀。今天應該摧毀復旦原來的惡勢力集團。

(9) 共產黨所以得到勝利，全靠虛偽、欺騙羣眾、拉攏一般人、打擊個人。

(10) 共產黨吃苦在先，享樂在後是假的。你看毛主席、朱總司令吃得胖、住得好。

#### 4. 仇視和丑化黨員、團員、積極份子：

(1) 黨員沒有獨立思考；人事幹部“政治可靠、頭腦簡單、冷酷無情、是非不分”，機械執行上級決定、不憑良心做事、不敢揭露黨內矛盾；小媳婦出身的婆婆，虐待人格外厉害。

(2) 脫產黨總支書記，一不教書，二不讀書，三不是職員，四不做門房工友，不知做什麼工作。

(3) 黨團之間也有“牆”和“溝”，產生的原因是某些黨員及黨的負責人“黨氣”太足，表面上謙虛，而事實上根本不接

受意見，甚至打击、污蔑。

(4)老黨員不行了，新黨員沒有經過鍛鍊，沒有什麼了不起。

(5)黨委培養下的黨員是一模一樣的沒有頭腦的木頭人，像算盤珠，撥一撥，動一動。

(6)除了毛主席外，愈是承上啓下的幹部，愈是官僚，愈要檢討，只是為了做官，根本就做不好工作。

(7)黨員的品質日益低下，黨章規定的義務，黨員並沒有做到，黨員不應高高在上，在人民之外。民主集中制成了集中的民主，越來越變成黨內決定一切。

(8)復旦最壞的是那些“唯唯諾諾”的人，這次整風必須把過去的這些歪風除掉。過去黨就被這一批迎合黨的人所包圍，黨也信任他們，如新發展的教授黨員，羣眾就不滿意，水平不高，都是屬於那批專說好話迎合黨的人。這些人在黨面前一套，在羣眾面前另一套。

(9)黨員就是“文、史、哲”（註：“文”就是“聞”，“史”就是“記錄”，“哲”就是加以推理。意思是黨員聯繫羣眾時只是听听意見，然後記下來並主觀的加以推理。）

(10)他們也想做好黨員，但他們對党性作了教條主義的解釋，強調立場。三反、思改、肅反以來把黨外許多人看成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他們劃清界綫，以致父母兄弟朋友都格格不入了。現在都是人民內部問題，過去党性理論中過于強調階級性，已經落后了。過去說，社會主義勝利，階

級斗争更尖锐，大家不敢讲话，党员也怕自己立场不稳要受批评，这是把党性纯不纯作了错误的解释的缘故。另一问题是党纪森严，这是共产党的特点，很好的；但党纪不是呆板的，党员也是个人，报上说党员缺乏人情味，为什么？这也是由于对党性作了教条主义解释。

(11)呢绒涨价，报上立刻出现文章宣传涨价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这与解放前的奴才味道一样，上级做什么总是对的，没有自己的见解。

(12)积极分子是拿打贪污分子来染红自己的颧子。

(13)在运动中越是撒谎的越是积极分子。

(14)党员是便衣警察。我们几个人在路上谈话，也会被某些党员拿去彙报。

(15)积极分子是投机分子、二流子、三流子。上面措施一来就拥护，奉承拍马，做党的尾巴，拿群众作为自己入党的垫脚石。

(16)乡村干部像个土皇帝，整天拿着杯子喝老酒。

(17)为什么党群关系不好？因为现在绝大部分党团员都是坏的。许多人要求入党入团，靠拍马屁。非党团员也有好人，他们不一定要入党入团。

(18)现在党员有特权，投机分子想得到党员地位来向上爬。不是党员，要爬上去就不是那么容易。

(19)某大学的党团员都不是人，对上拍、对下压，都是卑鄙无耻到极点的。我在某大学的一言、一语、一行、一动

都得受团员监视，离开了这学校，我才重新做人。

(20)“強求干部、盲目服从命令，宁左勿右；  
奉承领导，有心响应号召，只多不少”。

(21)“千錯万錯，馬屁不錯，这好那好，吹牛最好。”

#### 5. 挑撥党与羣众、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1) 共产党培养青年人，累死中年人，气死老年人。

(2) 解放后中年教师始終未被重視。在教师中分进步、落后，以响应号召来作标准，对落后的加以限制打击。

(3) 现在领导与被领导間的矛盾是正派与非正派的矛盾、拍馬屁与不拍馬屁的矛盾。“老实人”一講話就戴上了反苏反共的帽子，要受到打击排挤，而拍馬屁的都是进步份子、积极份子。千錯万錯，馬屁不錯，自古已然，矛盾主要在此。

(4) 老教师的苦悶真是一言难尽。我們經常生活在秋末的季节中，面对着某些党员那付冷冰冰的面孔，忍受着年青助教盛气凌人的批判，得不到领导的关心。

#### 6. 露骨的仇恨共产党：

共产党煽动羣众来搞别人，相当恶劣，现在民間有怨，我就是含怨者，为了维护真理，我要保留最后一顆子彈。

## 二、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 1.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1) 無产階級專政是三大主义的根源。因为無产階級專政是相信党员，党员人数少，了解情况不全面，作风又神气，



看不起党外人士，所以就产生了三大主义。

(2) 资本主义比三大主义好。因为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而三大主义则是有害无益。三大主义是目前全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

## 2. 讚揚資產階級民主，反对無產階級民主：

(1) 資產階級民主有可取之处，資產階級国家的报纸各种新聞都可自由發表，又如资本主义的兩院制也比較民主，又能使問題爭論得更明确，使問題更正确解决。因此，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可以考虑采纳。

(2) 我国民主不够，甚至沒有。如宪法中虽有各种自由的规定，但现实生活中却沒有言論、集会、遊行的自由。

(3) 我們只有选举权而沒有選擇权，不能保証真正的民主。

(4) 中国人比匈牙利人好統治，那个敢搞大民主？蔣介石那么坏，也不过是几个另星的工人、学生罢罢工、罢罢課。現在的政权还不是用槍桿子打出来的。

(5) 我国的新聞是机械化的，一面倒的。与宪法上规定的言論、出版自由有矛盾。人的头腦不会如此簡單，而是由于制度問題，民主問題。我国的新聞自由是有限度的。为什么抗美援朝运动中只登敌人的伤亡数字，而不登我們伤亡数字的。

(6) 党对待人分为几等，自由平等要打一个問号。

(7) “小民主”沒有保障，只有两个地方我才敢講話，一是毛主席办公室，中央政治局，或上海局；另一个是羣众大

会。

3. 詆毀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各种制度：

(1) 取消彙報制度和保密制度，因为这是不信任人民、不信任羣众、造成了人为的“牆”和“溝”。

(2) 人事制度是官僚主义。用人要看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不合理。建議取消“人事袋”，因为人事袋成了閻王簿。

### 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

1. 否定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

(1) 我們的政策愈执行愈精，人民羣众的積極性全給压制了。我們的生活水平非但没有提高，还降低了。

(2) 总结时总是說成績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千篇一律的教条主义。

(3) 新旧社会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只是按月發薪、不解聘。共产党这样下去，一千年也走不到共产主义。

(4) 統購統銷使几千万农民处在死亡的边緣。

(5) 中国哪里有解放？到现在为止，生活苦难的人很多很多。生活問題不仅是本校問題，而是全国性問題。普通人的生活比解放前还差，人民生活是普遍降低，少数提高，如一千人中間只有一、二人提高，国家只顧开工厂，不顧人民生活。

2. 否定和歪曲历次政治运动：

(1) 历次运动起了副作用，造成思想落后与隔閡。

(2) 历次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工作方式与共产党理想不对头。

(3) 对运动是拥护的，但做法粗暴、冤枉、造成無謂牺牲，使人民离心离德。

(4) 五大运动采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针是以群众压力叫人講假話；也是要群众自己斗争自己，狗咬狗。

(5) 运动的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偏差是难免的，这是原諒自己的說法。

(6) 三反、“思改”、肃反不合中国国情，打击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这是以力服人。古今中外都不能以力服人，只有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悅誠服。被斗争的人还比較干净，是有学問的；斗争的人則往往在旧社会为非作歹。

(7) 三反是組織上有意識發動群众，以压力来叫大家說假話，逼人造假賬、假坦白，是逼着人家套上一頂貪污的帽子。

(8) 三反时老实人吃苦头，成为运动中重点。

(9) 三反、肃反是偏听偏信，真假不分，制造很多矛盾，事实上是官僚主义者关起門来搞的。

(10) 思想改造是強迫的，等于強盜搶劫。

(11) 肃反时侵犯人格，沒有自由，屈打成招，冤枉好人。

(12) 肃反搞錯的多，正确的少，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逮捕的人現在又放出来，沒有搞出什么名堂，反而使大家不团结。方式上采取大胆怀疑，随便乱斗，侵犯

人权，不合法手續是对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和人格的侮辱。

(13) 肃反必要，策略上大失敗。

(14) 肃反对我们的名誉、人格、家庭造成了多么大的損害，是冰雹式的打击人，不單使我们痛，而且还要我们的命。肃反伤害了兩代人，至少五十年弥补不过来。

(15) 肃反时有些人搖旗呐喊，为了人民幣、地位，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乱搞一通。

(16) 肃反后系内“气象一新”，是有些不会拍馬屁的学会了拍馬屁。

(17) 抗美援朝运动是“死要臉、活受罪”。

### 3. 否定教改的成績：

(1) 现在看来，教改处处是硬搬苏联，是机械唯物主义。对青年人的培养，对工作时间的安排，都很机械，人是不能这样用法的，这样把人当畜牲还不如，难怪使人可怕。

(2) 全国各项工作中，高教工作質量最差，很多方面还未恢复战前最高水平。高教部是社会主义的千古罪人。

(3) 八年来許多地方与解放前比，是有进步的，但与發展比，缺点还較多，錯誤不算少。估价是：成績較差。具体的情况是：完整的教学計劃沒有，現在的計劃还是解放初和解放前的；教师力量薄弱，对老教师不信任，青年教师沒有培养起；教材沒有建設起来，科学研究也沒有开展起来。大家工作情緒很低，学生質量不高，系的發展前途茫茫然，教师煩躁，学生反感，领导涣散。

## 四、反对学习苏联破坏中苏友谊

1. 关于教条主义，特别学术上的教条，不是中国的教条，是苏联的教条，是十月革命的教条。中国也有教条，如果是中国的教条，如孔子孟子如何說，还可以，外国的更不开心。

2. 肃反时死个把人没有什么問題，这是苏联套来的。

3. 学习苏联只許說它好，不許說它坏，是以宗教徒的态度来学习苏联的。

4. 苏联專家全是教条，他們講的話沒有听头。

5. 以前講美国的月亮好，現在講月亮也是苏联的好。

6. 蔣介石比起斯大林、格罗、拉科西来，罪惡要輕得多。

## 五、歪曲整風运动及反右派斗争

1. 曲解整風目的：

(1) 这次該我們穷人翻身，有怨报怨，有仇报仇。

(2) 既整風，要处分的处分，要开除的开除，質量不好的应处理，和風細雨不能排斥这一条。

(3) 三反、五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是大張旗鼓地进行，但現在整風却是和風細雨地进行。

(4) 这回馬桶蓋揭开，臭不可聞；这次整風对于共产党是成败在此一举。

2. 搞乱整風方針：

基層干部文化水平低，作風惡劣，所以王造时主張整風

从基層开始是对的。党能否接受这一建議，是說明党有無整風信心問題；就是王造时的主張不对，也只是步驟上的問題，沒有什麼大問題。

### 3. 曲解整風方式和內容：

(1) 整風應該是和風細雨与狂風暴雨相結合，甚至可以是十級或十二級的颶風或龙卷風。重病應該用重藥医，痛改前非就該痛，應該狠一些。和風細雨不是对症下藥，尤其对基層干部，必須打打他們才有教育；对这些人需監視，成立監察委員會。

(2) 三反、肃反种种都是冰雹式的，今天对党的整風要和風細雨。比較之下，党对党員就好像是自己的亲生兒女，輕輕的拍，对其它的知識份子，像是童养媳妇。

(3) 整風，“党員应先檢討，羣众通过”，自助人助，因病求医。

(4) 請共产党人想一想，你們給中国人民帶來多少痛苦？今天你們坐下来叫人民提意見是形式。

(5) 共产党过去給人开刀，不知道病。今天要开自己的刀怕痛，和風細雨起包庇作用，是枷鎖。

(6) 党員最了解党内缺点，現在緘口如瓶，斗争性不强，叫羣众跑龙套。

(7) 党員和積極份子在整風运动中应坐下来，讓过去被斗的人斗一斗，讓他們自己嚐嚐味道。

(8) 共产党專門算人家的旧賬，为什么人家不可以算共

产党的旧账，豈有此理。

(9) 整風提意見可以过火、諷刺、謾罵，甚至打都可以。

(10) 給党提意見的人是医生，医生各有自己的藥方，是毒藥还是好藥，病人自己会判断，医生間用不着爭吵，因为即使是毒藥也無害，毒藥反能收“以毒攻毒”之效。

(11) 知識份子時間寶貴，整風应自己先揭發，否則別人沒法提意見；思想改造时你們不是常說：“自己做的事，自己还不知道嗎？”現在你也要愁眉苦臉的自己挖掘，我們只能幫幫忙。

(12) 整風运动应是洗刷党內的官僚主义分子、宗派主义分子，及主观主义分子的一个新陈代谢运动，才能把三大主义肃清。

#### 4. 阻撓反右派斗争；为右派分子辯护：

(1) 对右派分子是先戴帽子，后找材料，因此誰是右派只有党中央才能識別，而共产党要想搞別人还怕找不到根据？

(2) 党是存在缺点和錯誤，有些右派分子提出的缺点是事实，为什么把他們說成是別有用心，这样做会造成副作用，会影响鳴放。

(3) 反右派是共产党的釣魚政策，是不守信用的表現。右派分子不是客觀存在的，右派言論是沒有客觀标准的，只是因人而異。整風时党要求大放大鳴后，就發动对右派的圍剿。如果說不是釣魚，为什么在材料沒有揭發前，就說他們

是右派。

(4) 过去整風是風平浪靜，现在反右派是大張旗鼓。

(5) 儲安平是出風头，章乃器是理論問題。

(6) 王造时是七君子，把他的历史搬出来是不應該的，这是人身攻击。

(7) 葛佩琦的發言也有正确的地方，毛主席說过我們要向敌人学习，为什么不听听葛的發言。葛佩琦的發言是假定的，何必扣上反共的帽子。

(8) 儲安平的意見是作为一个問題公开向毛主席、周总理建議，戴上这許多帽子，以后誰还敢講話？

(9) 章伯鈞是聰明人，怎么会講出这种糊塗話来？恐怕是思想認識問題。

(10) 孙大雨的發言是快人快事，是可尊敬的硬骨头。为什么孙大雨提出反对意見就是反党？这样，人家就不敢提意見了。肃反运动时提出1%对的也要接受，为什么同样是运动，現在1%的正确意見就不能接受？即使不对也不應該給他戴帽子，說他反党。現在有把一切言論都压制下去的傾向。

(11) 对王造时的批判欠公正，給儲安平戴的帽子不当，整風結果搞民主人士了。对文匯報的批判是圍剿。这次批判太早了，不要戴帽子，理論性的問題以后探討。对民主党派做法是惩办主义，而党自己却是和風細雨，党如不同意这样（指鳴放），人民日报应出社論表明态度。民主党派罵得这



样兒，事实上是口是心非。右派分子的話錯了，大家也知道，何况未必錯，何必这样大搞呢？

(12)把右派的範圍是否扩得太大，对批評是否有好处？如王恆守，报上揭露的材料不多，思想言論也算右派，会伤一些人的心的。

# 匿名信

## 一

編者按：這些信中有一些別字和語法不通的地方，我們為了保持原來面目未加修改，並以（）把正確的字註出來。

無恥的徐尙(常)太：

你居然想用法律來威吓孫先生嗎？請問，中國有什麼法律？你和你的一羣，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在思想改造中，在肅反中，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不，不是冤枉二字所能包括的，是打是罵，是疲勞轟炸，是禁閉，是慘無人道的野蠻手段。你和你的一羣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沒有？要到提籃橋，你和你的一羣就得先去！人民等待着這一天！

孫先生是中國的靈魂，是讀書人的種子，是消滅不了的。誰要想消滅孫先生，誰就要自己被消滅！無恥的東西，清醒清醒吧。

一個曾經受過你冤枉的好人

講到法律真是一肚子的气。解放以來，殺了幾十萬乃至幾百萬的人，有多少是照法律辦事的？在歷次運動中，被迫投河的，跳樓的，上秘的，服毒的，也不知有幾千幾萬，其中絕大多數是好人。對於迫死他們的暴徒，有沒有一個受到法律的制裁？？？只要有一個，我們就算是一個有法律的國家。呸！虧你有臉來談法律。去年的匈牙利事件是無法律的，最

近的台北事件也是無法律的，要知道这种無法律的事件，是無法無天的統治者亲手造成的。呸！还有臉来高談法律。

这次，对于孙先生，我倒要看你的法律了。看你們再有胆量無法無天的干下去。

## 二

复旦大学  
全增嘏 你这个狗教授！

讀了你的發言！除了真正的暴露你是一个十分狡滑(猾)的暗藏反革命分子外，你还能怎样辯护！亦(也)許你說“以你为証”“我以此为証明你是反革命”請問在解放前你沒有狗子——反动派的背景如何能介紹孙先生做教授？

你解放后搖身一变，变成了一个“人民”！你真是一个不要臉的無恥之徒，反动派时你拉反动关系，可是解放后你拉共产党这个“狗匪的关系”說你拿共产党这个“狗匪的关系”說你拿共产党的薪水不上課来罵孙先生。請問不上課責任是孙先生！还是学校不給排課！我看，說句良心話，不要拍馬屁！你自己知导(道)！

最后“按年資和学术水平評工資”来作为你提意見！这又露出了你反革命的面貌！难道你替反动派工作，这个“功劳”还要人民补偿你！——写到这里我要問你是人还是狗！

你做了共匪八九年走狗，拿了一大棒(棒)肉骨头吃了八九年！但是人民終有一天要算帳，当烈火燒遍整个中国的时候我要把“毛”賊陈其五、楊西光等狗贼子和你一起統統毫不

留情的燒死，以洩真正人民的怨憤！

小心些你这狗教授，亦（也）許这封信亦（又）可以給你報功的机会，当然你有需要可以多給你一些，好吧！等待解放日报上为（会）見到你！

一个真正人民的声音

代表六亿四千九百万执笔！

### 三

敬爱的王恆守教授：

我是一个爱科学因而爱你的人。为了使能够为你說公正話，希望你能助我將此文轉登。

您未来的学生

（略）王恆守教授的一些論点是合理的，如像由受学生敬爱的导师来治理学校，無疑的对学术来说是起推进作用的；又如批判思想搞通了，那么工作学习都会搞好了的說法也是完全正确的，不应以發言者的优缺点去反駁發言者的言論，这是不合邏輯的。其实就是关于阶级的划分，它也只是对人的一种划分，是否可以用一种标准去衡量一切是值得研究的。当然这是应从定义和分类去着手研究的，如果应该修正，那么修正也是完全必要的和好的。

（略）用免职用反党反苏去限止（制）少数敢言者發言是可恥的，这样做可以使人口服而不能使人心服。（略）他們所以如此，只不过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最令人不滿的，是農民的生活，仍然處於貧困狀態。  
（略）如果說農民和工人的比較說得過去，那麼和那些丰衣足食的幹部來比較又怎樣說得過去呢？（略）

## 四

舒宗僑同志：

這次的“爭鳴”與“齊放”可說“搞得很糟”，糟在那里呢？事實很明显，凡是“歌頌功德”“丑表功”一類的文章，大為歡迎，如果是屬於耿直公正為民喉舌的呼喚與批評，必遭受“反批評”式的打擊！于是一些應聲蟲之類的留聲機器販子，自以為“惟我獨忠”者（章乃器駁斥對方語）就噙噙而鳴，向你圍攻的了！

（略）我很想用“唯物辯證”的精神（舉實例少說廢話）來寫一二篇東西來爭鳴一下（略）。

（略）為了怕國際人士竊笑，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化了！可是依然一貧如洗，窮見骨頭，因此“打腫了臉裝胖子”的事是有的：A.例如我杭全（州）市的建設經費竟以70%專門裝點西湖！B.又如內地居民農民每月每人食油四兩，上海則每月每人14兩，表面上裝裝樣，所謂中外人士國際方面觀瞻所錄也！又見布票對折使用，甚至提倡一星期難得三四天開工，盡量減產，如此等等，都又與國際觀瞻所系無關的了！

（略）今則朝令夕改，一日數變，使羣眾猶疑惶惑，莫知所可！食不飽，民有飢色，每日油一錢許，缺乏脂肪，民

多菜色，而却裝聾作啞，不聞？不見？僅見忍心殘苛，一至于此？試問上述種種現實矛盾，誰實為之？敦令故之！

只有一項標準，目前確是絕跡而少見的了！即“廢除苛捐雜稅”因目下各項捐稅，疊狀（床）架屋，超過舊社會時數十倍，即以農民而論，以前農民田賦，本來是什一抽稅（漢時甚至什五抽一，有歷史可考）今則對農業生產合作社，拿了一年中所得的40%去，社員們所得，只剩60%，本來一百塊他們錢，只40元到手了！還有比這個更殘苛的嗎？剝削要消滅，本也做不到，不過吃吃，心不要這樣狠，如果少吃一些，一切矛盾，早早可以迎刃而解的了！（略）

諸如此類的矛盾問題，誰造成的呢？如今用“細雨和風”的方法，希望你們“輕描淡寫”作出“不痛不癢”“小罵而大的批評（？）”有些人太天真，居然大放大鳴，結果是大帽子紛紛飛來，如“緊箍咒”如“金鐘罩”你受得了嗎？圍攻圍剿之下，說你錯誤性危害性很嚴重，你吃得消嗎？

說來真令人好笑又通（痛）心，說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作（足）戒！可是當你指出矛盾，予以批評時，他會在組織方面，組織一羣無恥之徒的“佞鬼”，來向你反噬，其聲猖獗，其勢兇兇，張牙舞爪，大有一口將你吞下的樣子，因此我很為一些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呼冤，你們別再天真的了！“孺子不可教”“朽木已不可雕”“諱疾忌醫者”早已不可救藥，你們就省了一些精神，讓他從自生自滅中死亡吧。

熊夢飛 1957.6.15.

## 五

### 臭 蛆 論 夢熊 繼庸 选民合稿

(給舒宗僑的文章)

爬在糞窖里边掙扎着的蛆虫們，虽愈陷愈深、愈弄愈臭，然而牠还是向上爬，而且拚命爬，爬到中間跌落下去，弄得發昏章第十一，牠还是往上爬，大有愈挫愈奋再接再厲的“革命”勇气，不仅如此，而且牠又自以为很香，滿身芬芳，大可以流芳百世的样子，盖已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而長与糞窖結不解緣，倚此为生，骯髒一氣之下，有人說糞窖太臭，蛆虫勃然大怒，認為侮辱了牠那主子一般的靠山了！於是大声叫嚷說：“我是香的，你們才是臭不可近哩！”

这糞窖历有年所，本来确是臭得很，人皆掩鼻而过之；可是管理糞窖的米田共先生（典出三笑唐伯虎），却偏偏糾纏着人，說是“欢迎批評指教！”同时米田共表示自己的态度，“虛怀若谷，从善如流。”于是过路人紛紛对米先生說：“你这糞窖太齷齪了！瞧！蛆虫这样多。”語犹未畢，蛆虫們立起圍攻，来了一个“反批評！”其势洶洶地說：“我們自以为香得很，你因何香臭倒置，薰蕕不分呢？”一时臭气逼人，向批評者迎面扑来！其势之猛，不亞于毛廁中之屎蜚螂，好不厉害，於是原来批評者，立刻退避三舍，掩鼻搖頭而逃。

結局呢？不但臭蛆們如噬人的臭虫們一般地洋洋得意；而那位与臭蛆們長期厮守管理糞窖的米田共先生也暗自得

意。因为甯旁虽然还挂着“欢迎批評！”的那塊招牌，可是細雨和風之后，再也沒有人批評了。

## 六

復旦大學外語系的一羣代表同志們：

我是一個道地的老百姓，我關心着世界，關心着祖國，也關心着周圍的一切。今天我在收音機里聽了你們一羣人去見孫大雨的實況錄音，我情不自禁的要和你們談幾句。第一我覺得你們為什麼要推這麼多人去見他呢？六十個人氣勢洶洶的湧入一個病房內，發言一點也沒有秩序，我彷彿看到了你們一個個猙獰的面孔，像要吃人似的，你們認為這樣就可以壓服了嗎？錯了！完全錯了！真理是像明珠一樣的不可壓服只可說服的，我經常聽人說：匹夫不可以奪志，何況一個大學教授？當孫大雨向你們答辯的時候，你們好像一個個都變了土皇帝和審判官，表現得一點耐心都沒有，不想聽完他的話，亂得像一羣蜂。你們既要他講話又不讓他講話，真是無理取鬧的典型了。第二孫大雨究竟是你們的老師或者是同事，你們怎麼就對他表現得一點禮貌都沒有，他是一個有病在身的人，你們向他說了一句慰問的話沒有？可能他是絕右的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簡直沒有兩樣，因此不值得你們慰問，但是在法院沒有宣判之前他總是你們的老師或同事，所以今天你們對他的這種表現是超出法律範圍和人情範圍的，尤其是你們在臨走的時候還高呼口號，蠻橫和兇狠得使一個沒有



病的人会吓得生病，叫一个有病的人怎么吃得消？一个犯人在枪斃之前，从前还給他一杯酒吃吃，减少他肉体的痛苦，而你們就忍心的使他神經錯乱，使他不能反省，使他不能工作，使他成个“反革命分子”这和毛主席所說的：团結——批評——团結的做法，难道有絲毫相同的地方嗎？

亲爱的代表同志們！我希望你們多看看中外古今的历史，多讓文学来陶冶自己的身情，具体領会毛主席报告的内容，要愛这个时代，不要帶着仇恨的心来猜度所有批評党的人。你們要真正的掌握馬列主义，能分析問題和看出事物發展的趋向，不要学做国民党时代的“特务和打手”，要做个謙虛的随时随地态度温和的同时又能引导事物向正确的方向發展像毛澤东一样的布尔什維克。

亲爱的代表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要謹慎啊！

一个道地的老百姓啓

七月五日

## 七

九三学社复旦支社全体社員同志們：

我怀疑你社突然来一个所謂对王恆守揭發和批判：

王恆守过去的論著也好，意見也好、批評也好，肯定的說都是中肯的，因此我对你社的这种所謂揭發和批判認為倒是“蛮橫”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希望你社深思一下这一动机由何而来。

你社对王的揭發批判一通，外界是否能服？請你們社不必再組織如此會議了。

告訴你社所有同志們，看報的也都是明眼人。

你社一定会認為这“揭發批判”的反应很好，的确我也信假使你社邀請外界人士（無論那方面的）座談的話，一会一致举手讚成啦，拥护啦！我也可举双手讚成，但希望社能多多深思一下：这是口服，抑是心服。（但我已深感能停留在口服上）

希望你社有些同志对“第三方面”的“指示”也好，批判好必須心服，不要枉失九三社員。

我是个普通工人，（解放前也是个普通工人）今天生很好很安定，我很爱护帶有广泛科学界人士的团体——九学社，今天因为有許多同志認為你社这样做法不当，与其是揭發批判不如說是在圍剿王恆守，实际的反应，辯解是效的，为此写信提醒你們！勿盲目受人指使。

工人中肯敬上

六月二十日

## 八

复旦大学民盟支部負責同志：

当在你們支部發現自己同志有錯誤的时候，對他們提批評是很好的；但你們中的部分同志提出對他們處罪是不的。停止教授职务等行為是（不）符合中共的方針的，是否

了报复因素在内，我們对这种处理提出严重抗議！

另外請你們轉达我們同学的心去調查，請你們相信，我决不是有用心的人，而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民大学生，在政府利用“右派分子”帽子把人民意見压下去，使大多数民沉默，这种沉默，乃是中共新危机的标志。有良人(心)中国人民应该服从真理，真理是永远存在的世界上沒有真被压得住的。你們說意，我們对有些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虛伪的，党天下，完全支持。因为客观现实是这样，新聞、出版、結社、集会不自由完全是事实，每一單位有中共黨員也是事实，选举的高度集中，更是不民主的表，农民生活很苦也是真的，不信，請政府派調查团到农村，嗎？

华东紡工学院二十个同学

六月三十日